

繞開、修復與「移動學習」： 深圳青年農民工「當老闆」與「見世面」的學習民族誌研究*

方怡潔

國立清華大學
人類學研究所

Paul Willis提出「傢伙們」表述清晰的「反學校文化」來闡明底層學子在看穿學校機制之後的反應，本文要以農民工的案例來描繪捕捉另一種看穿學校機制之後的反應，即繞開、修復與「移動學習」。透過分析深圳電子廠內一群「不想讀書但很想學習」的青年農民工遠赴深圳工廠打工所展現的學習策略，本文提出「移動學習」——一種不挑戰原有體制，但又能夠為行動者帶來想像、產生願景的學習方式——說明農民工如何以此來修復學校體制失靈的承諾。

放棄受教育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並非「壞學生」，這個標籤既無助於了解他們的處境，也無法透過用資源使他們成為「好學生」而解決中輟的問題。農民工並非落後、無法學習、缺乏動力或不想學習，而是早看穿他們在教育結構化中的不利位置，「提早進城打工」成為替學習尋找替代方案的結果。這反而展現他們在對抗不利結構時的修復能力與能動性。在「移動學習」中，生活、勞動與學習的界線模糊，也無教與學的二分，農民工透過現場觀察、旁聽、模仿、默會、實作、競爭與合作以及經驗分享等方式來習得知識與技術。一方面藉著到城市「合法邊緣參與」該社會場域的知識與技能，拼貼組裝學習資源為己所用；另一方面則透過移動所產生的城鄉結構裂隙，去挪移文化品味、社會經驗與象徵符碼成為回鄉後轉換主體性的資本，試圖以此

投稿日期：2020年3月30日 接受出刊日期：2020年8月26日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工學與行知：比較農民工與青農的移動軌跡與學習模式看「實作」學習的階級性與能動性》(MOST 105-2410-H-007-071-MY3)的部分成果。感謝深圳田野報導人的信任與分享。感謝李威宜、許瀟文、宋剛與黃克先閱讀本文初稿，並給予寶貴意見，也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的建議，惟文責由本人自負。

向上流動與提升社會地位。然而，移動學習仍有侷限性，學習所需的資源、機會與每一步的銜接，皆非制度性過程，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等待、機遇巧合、主管的賞識和學習者自己的額外勞動（例如表現出忠誠、苦幹或勤奮等）。

關鍵詞：看穿，去技術化，非正式學習，移動，勞動

我自2007年年底，開始在深圳一家名叫「泰效」的電子工廠進行農民工研究，很快我就瞭解工廠裡農民工的學歷普遍不高，大多數僅讀到初中，有的甚至連初中都沒畢業，就跟著親戚或鄰居外出打工，有的才十七歲，就已經待過了三、四個工廠。若問他們中輟學業的原因，除了家庭經濟無法負擔之外，很多人明確地說「是我自己不想唸書了」、「對唸書沒有興趣」。這樣的說法，似乎符合了一般刻板印象：「不喜歡讀書、缺乏學習動機的孩子就去做工」。

但事實真如此簡單嗎？工廠裡的青年農民工明顯是「好學」的，他們並不缺乏學習動機，甚至動機高昂。若問他們為什麼來經濟特區打工，他們很常強調來此是要「學東西」，問到跳槽或換工作崗位的理由，也常常聽到「學不到東西」，或是「想學點東西」。在工廠休息吃飯時間跟農民工們閒聊時，若問青年農民工來經濟特區的工廠工作感覺如何，他們很常會說：「學到很多」。「想學東西」、「學到很多」被提起的頻率之高，讓我不禁想要追問，到底在工廠內可以學什麼，又讓農民工學到什麼？農民工的「好學」現象引起我的研究興趣。

到底為什麼，來到經濟特區的工廠之後，會讓一群在家鄉學校裡失去學習興趣的青年，開始急切地想要在工廠裡學習，甚至以能不能學到東西，來衡量與決定他們要不要繼續在同一個工廠工作？他們「不想唸書，但很想學習」的這種反差，讓我重新思考移動、工作與學習之間的關係，並考慮學校之外可能的學習途徑與機會。

目前對農民工教育的研究多半聚焦在學校，特別關注戶口制度下農民工子弟就學的困難，例如農民工子弟如何被排除在公立學校之外、農民工子弟學校學生與學校的特點，或是農民工所能負擔的教育狀況，又如何再製制度性的不平等，並是否有提供向上流動的可能性（Chen and Feng 2013；Goodburn 2009；Koo 2012；Ling 2015；Xiong 2015；Yan 2005）。若把教育機會與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當成是移動的因，研究者會把焦點放在農村教育的崩解之上（如拆點併校、師資頻繁流動、學生缺乏學習動機），若把教育機會與教育資源不均當成是移動的果，研究者則會特別關注農民工子女進城後受教育問題的斷裂（農民工沒有城市戶口，其子女無法在城市中的學校

註冊，因此進城之後出現許多教育問題）。這兩個觀點普遍視學校教育為農民工教育的全部，甚少關注農民工在學校外的學習。這種預設「學習」只在學校內發生的前提，不但窄化了教育的定義，也忽視了學校本身就是「社會的」，人們對教育的選擇，深受教育實踐過程中政治經濟結構的影響（Portisch 2010），若不正視學校體制早已鑲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政治經濟結構與社會文化脈絡之中，在議題分析上可能會遮蔽了更根本的問題。

中國近幾十年來特殊的發展模式影響農民工的教育選擇最甚，這個發展模式與改革開放、世界工廠浪潮和城市化擴張的過程交織在一起，也在所謂的戶口制度、城鄉二元體制下更加複雜。這些制度環境與結構變動，吸引了紛紛前來深圳設廠的台灣工廠主，也為農村青年的生命機會設立了前提。城鄉二元結構是影響當代農村青年就學與工作選擇的關鍵。在這套體制下，人口根據其戶籍被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者「享有差異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形成了具有強制性、世襲性的城鄉分割和公民身份的不平等」（楚德江 2012：125）。城鄉二元體制讓農村在各種資源上遠遠不及於城市，教育經費在城鄉之間更是差異顯著（夏茂林，孫佳慧 2019）。發展過程中農村與城市之間的不平等擴大，也製造了所謂「三農問題」。留在農村，等於被摒棄在發展過程之外。

除了戶籍制與城鄉二元體制之外，農民在發展過程中更遭遇到身份的挫折。農民身份在中國不同的發展時期，被當局與知識份子以不同的方式定義，其曾是「工農聯盟」下的領導階級，但在改革開放後，其身份意義已經被改寫，成為落後、低素質的代名詞，也被視為是拖累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群體（Anagnost 2004, 2006；Jacka 2006；Kipnis 2007）。農民工即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大量進城。

改革開放後，中國一方面市場化，放鬆戶籍制度，使得農民得以進城打工，另方面卻繼續戶籍制度，打工的農民僅能暫時居住在城市中，這種暫住的狀態，也得他們在勞動條件上缺少與雇主討價還價的能力，並一直被懸置在明明做著工人的工作卻仍是農民身份的狀態中，這被潘毅與盧暉臨等學者稱為「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Pun et al. 2009；Pun et al. 2010），或是「賤斥的」（abject）（Jacka 2006），其公民身份不完全且缺少保障（Wu

2011)。是否該要廢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也持續在學者間進行辯論（夏柱智、賀雪峰 2017；楚德江 2012；賀雪峰 2014）。

「在2007年到2018年之間」，亦即我進行田野至今的時間，深圳這個城市可說反映了中國政治經濟脈絡與市場化路徑的變遷。深圳於1980年成立為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 SEZ），其成立是後毛時期的政治性策略創造，深圳的存在彷彿證明了中國的黨國體制也能實行經濟自由化，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顛覆了共產黨統治下的經濟失敗歷史（O' Donnell et al. 2017）。但Mary Ann O' Donnell, Winnie Wong, 和Jonathan Bach也指出，其實深圳的成功並非出自如黨國宣稱般一致的政策和計劃，反而是在其一系列例外的、實驗的、甚至非法的（指沒有經過審批核可的）過程中創造了所謂的「深圳奇蹟」。這使得深圳成為一個有兩種面孔的城市，一面是經濟繁榮與奇蹟般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充斥有據可查的剝削、折磨、同謀和非法活動，兩者形成鮮明對比（O' Donnell et al. 2017）。

這一切都隨著政府2010年以後意圖將深圳打造成「模範城市」而逐漸消失。當深圳充斥著模範領導人、模範工人、模範村莊、模範產業、模範機構和模範治理時（O' Donnell et al. 2017），在深圳出沒的農民工也開始面對不同的深圳。2010年以來，高鐵、高速公路和地鐵逐步建蓋完成，這促進移動的便利性，縮短了移動的時間。農民工從最偏遠的關外，也可以搭上地鐵進到深圳市，或是就近到工廠附近車站，就能坐上高鐵回家。除此之外，智慧型手機也更加普遍化，網路影響了農民工的人際關係和訊息交流，也影響了他們對於移動、空間的實質感受和距離的想像。

2007年，我在工廠內遇見主動選擇放棄學校教育，並希望透過在工廠打工來尋找學習機會的農民工們，在2018年，已有了各自的發展。我想去追溯他們這一段時間以來的經歷，看他們在深圳「學」到了什麼學校不能教給他們的，並釐清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脈絡與個人考量下，讓他們產生如此的教育決定？但首先，我很好奇，他們是否如Paul Willis筆下的「傢伙們」一般，看穿了學校教育虛假的承諾？

Paul Willis的《學做工》為底層青年的學習狀態立下了一個經典的分析案例。他指出工人子弟已經部分洞察了真正決定工人階級生存狀態的先決條

件，在這種背景下，工人階級子弟因而發展出反學校文化，藉此再創造、重新發展並改變某些大環境的文化面向。抵制權威、摒棄教條是這些傢伙們反學校文化的明確特徵：他們不認為知識有價值，透過風格化、儀式化的反抗，創造出一個非正式世界，用以抵抗正式世界，並在其中尋得意義。但悲劇在於，這些「洞察」（penetrations）往往在不經意之間，被一系列複雜過程給限制、扭曲、攔阻，包括學校本身的意識形態，使得這種洞察最終只淪為自我詛咒：在工人把自己的認同定位為中產階級文化（如學校文化）的外人的過程中，他們再生產了自己與下一代成為工人（Willis 1981）。

「不想讀書卻很想學習」的農民工們，某種程度，他們從學校中輟，或是決定早早放棄升學，也彷彿是一種低調的「反學校文化」，他們像是看穿了學校承諾的虛假，知道在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村子弟就讀鄉村學校難有出路（我將在後面章節中詳細討論）。但在採用「看穿」這一個觀點來進行解釋之前，我認為必須先思考，農民工是「看穿」我們認為的結構，還是他們拿不同的觀點在看我們以為的結構，所以必然有完全不同的詮釋、決策理性與後果？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勢必須先去理解農民工在想什麼，他們如何思考他們所身處的教育體制與對學習的主觀認知。

其次，我認為關鍵問題除了「看穿」之外，更在於，那看穿之後呢？在Willis的例子裡，傢伙們看穿之後，繼而就採取表述清晰、明顯可辨的反抗姿態，但若把文化的面向加進來討論的話，這種反應卻可能僅是少數特例。Kipnis曾撰文討論為何Willis描述的「反學校文化」僅發生在一些英語系國家（英國、澳洲、北美）中，卻鮮少在非英語系國家發生，他試圖識別出是何種社會力在助長或是阻礙這種表述清晰的反學校文化的形成。Kipnis以美國為例，主張在「反學校文化」盛行的地區，其文化（如美國文化）價值本身就鼓勵表述性的個人主義（expressive individualism），在教育過程中要求孩子要時時表達自己的情感、意見和偏好，一方面給他們很大的自由表達自己，但另一方面也不給孩子「不表達自己」、「保持靜默」的自由。在這種非常強調自我表達的意識形態下，孩子們就會以戲劇性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次文化或是反學校文化。所以說，必須考慮是特定文化環境的社會力助長下，傢伙們才會／能形成表述清晰的反學校文化。青年一方面會想要有群體歸屬感，有

友朋陪伴，但另一方面文化又要求他們要表達出能被看見的自我獨特性，所以透過形成「反學校文化」，學生們找到一個方式能夠去平衡獲得群體歸屬的慾望和必須呈現個體性的文化要求。從這個觀點來看，「反學校文化」在看似反抗權威之際，卻是在服膺一個更大的權威。亦即，青年們若是去「服從」學校權威給出的集體認同，才是在「挑戰」美國的社會常模。Kipnis也因此繼續以中國學生的例子，探究各種「沒有反學校文化的」反學校行為（Kipnis 2001）。

若從本研究的脈絡來看，我認為Kipnis最有趣的觀點是指出「移動」本身就是一種反學校行動的選項。移民常常特別渴望社會流動，而選擇移動，就代表著相信向上流動的可能性，而這種向上流動的可能性，並非來自於對於系統的挑戰、重整或改革，而是移動本身就會帶來想像與可能性（Kipnis 2001）。Willis的傢伙們是透過反抗學校文化，來開啟非正式空間，重新意義化他們的世界。而農民工的選擇與反抗相對，他們沒有打算要針對學校教育系統進行衝撞，而是透過移動（離開學校）去開創想像與可能性，進而開啟能夠重新意義化的非正式空間。他們進城打工，尋求學習機會，來應對學校的失能，與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污名，相對於「反抗」，我把這樣的回應稱作「繞開」。繞開之後，農民工積極在新的場域中尋求學習的機會，以達成他們心中認定學校教育應該實現的向上流動的承諾，我將這種舉措稱為「修復」。而繞開學校、尋求修復可能性所經歷的整個學習過程，我則稱之為「移動學習」。¹簡言之，我試圖在本文中提出一個繞開與修復的模型，用「移動學習」的概念取代Willis的「反學校文化」，來探討農民工們在看穿學校教育的虛假承諾之後的回應。

那下一個問題將是，工廠裡看似「去技術化」的環境有任何學習的可能

1 若主動選擇離開學校可視為是一種「看穿」後的行動選項的話，我想先識別出傢伙們及農民工與學校教育相關的幾個差異。前者對工人文化有強烈認同，後者則想要擺脫農業、農村、農民落後與低素質的污名。前者對於學校勾勒出的向上流動路徑不感興趣，一心想要繼承父業，後者並非對學校勾勒出的向上流動路徑無興趣，只是不相信鄉村學校可以履行這樣的「功能」。前者在以上的脈絡下表達出清晰的反學校文化，強烈的抵制權威、反對教條，而後者則離開學校進城打工，試圖以不透過學校的方式達成（學校可以幫助個體達成的）向上流動。

嗎？若有學習的可能，可能性會在哪裡？對於農民工而言，在工廠這樣的生產環境中進行學習，究竟反映了怎樣的客觀事實與主觀想像？農民工也看穿了「去技術化」的生產環境嗎？生產環境中的教和學，和學校教育方式非常不同，我們該如何理解、分析這樣的學習？以下我將先從文獻來進行討論。

一、生產環境中的學習

在生產環境中的學習有幾個學術典範，大致可歸納為「學徒制」、「去技術化」以及「偷學」（靈活主體）。首先討論「師徒制」；這方面的研究，人類學家貢獻許多，從社區中的共同勞動、小作坊到工廠都有研究，產業也跨越許多類別，包括石匠、泥水匠、木工、陶瓷業、紡織、造船等（Gowlland 2012, 2009；Herzfeld 2004；Marchand 2008, 2010a, 2010b；Naji 2012；Venkatesan 2010）。人類學對於師徒制的研究多半指出，師徒制在學習的不僅僅只是技藝，技藝之上所承載的意義、技藝執行過程中的社會互動、以及擁有技藝後如何「做一個技術人（如石匠）」，才是學習的重點。以葉門的尖塔建築學徒為例，其學徒制為期五年或更長。技術對於工匠而言，無法直接言傳，普遍強調掌握技術的關鍵是「直覺」，如當「充滿眼睛」時，就是正確的比例。做一個徒弟，必須先到現場協助進行常規式的低階工作，在其中學習工作中的隱性意義和前提，之後則漸漸學習相關的管理技術，例如如何安排一天的勞動及帶領一個工班等。學徒過程，還訓練工匠能夠擁有伊斯蘭虔敬的態度，以及合乎道德的舉止。因尖塔建築在建蓋時過程危險，因此建築學徒也被訓練要尊重權威，服從工匠之間嚴明的階序。簡言之，葉門尖塔學徒所要學習的遠不僅是技術而已，許多圍繞技術的社會性知識都是學徒制的重點（Marchand 2008）。類似的，在印度南部Pattamadai鎮進行的Labbai編織工研究，也一樣指出女性編織技能的習得，不僅是習得技能而已，而是和女性的身體、性別認同、以及該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與對技能價值的看法等交織在一起（Venkatesan 2010）。同樣的，Mali的泥水匠在技術之外，還要學會唸咒和施福，在地基中埋下祝福的人工物，每日唸誦咒語，確保建築團隊以及未來住戶的安全（Marchand 2008）。印度造船廠內

的學徒，除了要能熟練掌握造船相關知識，還要知道在不同位階該有的行為與權力，學會社會階序並掌握社交技能（Simpson 2006）。

這使得當師徒制往學校教育轉型的過程中，常暴露出僅傳授技術的不足。當師徒制轉變成當代職業教育時，常只教授動作、技巧，而忽略了其他如價值態度、社群互動和身份認同等社會性技能與知識。例如在Central Slovak的蕾絲編織一旦被圖紙化並在學校教授時，雖然能讓技藝在教授、傳承與製作上都變得有效率，易於分享與保留，但也讓之前編織時必要的人與人的互動機會消失，編織者互相分離、獨自工作，理論和實踐分開，也把技藝的意義從社會、歷史背景分隔開來。在學校中教授的蕾絲編織，因而僅僅只剩技藝。對當地工人而言，他們不懂為什麼需要保留圖紙，每次編織都該是一個新的創意（Makovicky 2010）。一旦學校教育圖紙化了編織技術，表面看似技藝得以保留並分享，卻也同時扼殺掉「每次編織都是新的創意」的機會。類似的，英國自中世紀以來就建立的七年學徒制，在工業化之後發生改變，向來密切的師徒關係，帶入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以往是由師傅來認定徒弟是否具有加入行會並開始執業的資格，現在效率和經濟價值成為訓練正確與否的衡量標準。國家隨後跟著介入，成立當代的技職學院，技術學校三年就可以畢業，課綱標準化，學生技術的衡量與專業資格取得改由考試來決定，這樣的轉變過程造成「技術至上」，排擠掉了之前學徒制中跟技術一樣重要的社會舉止、專業精神和商業能力的學習（Marchand 2008）。連有心保存傳統工藝的NGO，都可能因沒有真正理解在地人對於技術及其價值的看法，而不能對於技藝傳承與發揚光大對症下藥。例如僅解決了外部問題（如改善織布機、直接銷售避免盤商剝削等），卻忽略技藝傳承的重點不僅只是學會編織（技術）或銷售順暢，而是讓實踐者獲得身份，例如，學習如何成為一個織者（Venkatesan 2010）。

第二個關於生產環境中的學習的學術典範為「去技術化」。強調工廠是一個「去技術化」的地方的學者主張，工廠的管理者為了壓低成本、增加效率，很大程度標準化了工作流程，每個工人只負責一小部分的工序，簡單、重複，不需要技術也能夠完成工作。去技術化使得沒有技術的工人也能夠進工廠工作，也讓工人容易被取代。管理方藉此把工作流程的控制權從工人手

上拿走，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方面能主宰工人的工作量與速度，另一方面也不怕沒有勞動力。這種生產模式下，工人都被「去技術化」（deskilling）了，進工廠是學習的終止，甚至是一個「反學習」（unlearn）的過程，例如已經是一個有技術的工匠，進入工廠只會迫使他放棄原有的技術，轉而配合標準化與機械化的工作流程（Braverman 1974）。去技術化的研究典範某種程度排除掉了工廠內有效學習的可能性，主張進入工廠根本學不到技術，工人會因隨時被取代而失去認同或是形成負面認同（Carrier 1992）。

第三種學習典範，我將之稱為工人作為一個「靈活主體」所進行的「偷學」。這種學習典範要成立，必須先重新理解與定位學習。我在此援引Lave的研究成果來進行解釋。Lave（1991）認為學習並不是來自於個體把外界的知識內化，而是一個去成為「實踐社群」成員一份子的過程。她將其稱為「合法邊緣參與」（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合法邊緣參與者並非實踐社群中的正式成員，但是可以在社群中合法的觀看並學習，並逐漸取得該「實踐社群」中正式成員的身份。Lave的學習理論強調學習在本質上有情境性與社會性。她對於知識技術的觀點也強調是分佈在社區中、由眾人共享，而不是被特定的個體所擁有，因此反而要超越師徒制對於師與徒角色的強調。學習真正需要的不是拜師，而是參與到一個「從業者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tioners）當中。師父只是給予徒弟參與到其中的機會，只要身在社群中，就會自動開啟學習。因此，學習常是在不經意中發生的，「先知道、後學會」本來就是一種常態。學習也是一個改變自我認知的過程：學習者在一個共享知識的社群中進行學習，在學會一項技藝的同時，也取得該社群的社會身份。

但Lave指出這一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都發生了改變。資本主義下的實習制度是資本獲取免費勞動力的方式，與傳統的師徒制提供的學習環境大相逕庭。例如超市砍肉的實習生，根本接觸不到砍肉師傅及其工作，而是在進行包裝工作。工作被切割，降低人的重要性。但對Lave而言，更根本的原因在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知識可以被販賣盈利，早先實踐社群的知識被分割成一個個專業，讓知識從共享變成擁有。本來知識應該是散佈整合在社群之中的，卻成為被分隔、獨立於社群之外的財產。為了要能成功的商品化勞

動力和知識，社群實踐常被有意識的減少發生，好去支持專業認同的發展，這過程把認同和知識實踐分開了，當今社會的社群學習的可能性越來越少，個體要從邊緣參與轉變為完全參與非常困難（Lave 1991）。此外，資本主義在生產場域中，同時把物擬人化和把人物化。當異化發生時，個人認同與技術增長之間的關係就會去連結，而不會同步發生。只要在資本主義組織工作的方式上，所有形式的學習都會有剝削的特徵，不管是不是「恢復」學徒制（Lave and McDermott 2002）。Lave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學習的看法，某種程度呼應了「去技術化」的研究典範。

與指出「去技術化」的學者不同，Lave（1991）並沒有因此完全否認工廠內學習的可能性。Lave強調，即使正式實踐社群已發生異化，真正的學習仍然可能存在。Lave指出在學校和工作場所這些被正式組織給規範的學習及其實踐社群中，通常真正的學習是發生在「組織外」、「沒有教」的時候，發生在學生與工人之間自發性形成的非正式實踐社群（the formation of informal communities of practice）當中。Lave主張在學校與工作場所中的標準化、評分、去技術化、等級化、或把完整的行動拆分成微不足道的碎片等，這些都是在「去意義化」並形成負面認同，也抹滅了做一個知識活動的參與者，邊緣參與的可能性。於是，為回應這樣的壓力，學生與工人會在機構內外，在嬉鬧互動中，在機構不教的時候，自發形成不被認可的、在制度上不被贊成的、在縫隙中產生的「非正式實踐社群」，去發現他們自己覺得「真實、有價值的知識」，例如Paul Willis（1981）的「傢伙們」所形成的反學校文化就是一個例子。

許多關於工作場所中探討學習的民族誌亦不約而同的提到工人們的「偷學」。千里達女工在幾種可以學習技術的管道中，認為在工廠裡偷學技術，是她們最佳選擇。慈善機構的脫貧班與技職學校都被女工批評為只注重觀念，缺乏技術實作。女工們認為「從工廠偷學，你會覺得自己聰明，因為你知道該偷什麼」，這對於形塑她們是「靈活的」認同至關重要。千里達婦女會選擇進製造國際時尚品牌產品的大型紡織廠，這不僅是工資考量，還是要藉著工作的機會，去偷（steal）一個機會／技術，如竊取衣服的模板、學習最新的時尚等。因為時尚一直在變，所以這個學習的過程是沒有止境。女工

們全都在偷著學習，因此不會彼此舉報，而工廠管理者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使看見也通常默許發生。但工廠裡去技術化的工作環境難道沒有澆熄女工學習的熱情嗎？工廠內確實有多零碎，重複性工序，但對於女工而言，工廠要求速度和數量的工作環境，可以「讓手記得知識」，反而是一個鍛煉的機會（Prentice 2012）。

女工們偷這些模板、時尚款式，主要是要拿回家，在家裡接單工作時可以使用。千里達婦女普遍將正式領域與非正式領域二者靈活結合，亦即在工廠賺取工資的同時，也在家庭裡給外面的客人接工作。這種做法有助於她們維持生計，Prentice將之稱為「即興生計」（to improvise livelihoods）（Prentice 2012：401）。²

Prentice指出「即興生計」的根源來自於千里達奴隸制度的歷史。奴隸制度強調彈性生產，奴隸被允許在廚房後面的田地自行種植作物，所獲均歸奴隸所有。這樣的安排讓奴隸一方面是奴隸，另方面卻又是獨立的市場行動者，透過交易獲得獨立自由的感覺。這一段特定的歷史，打造出千里達人特定的主體性，亦即強調價值、獨立與競爭，恰好吻合新自由主義所推崇的主體。也因此，在千里達，女工將不穩定的工作環境當做挑戰，若能克服艱困的工作條件，就是證明個人成就，她們在這個過程中感到滿足、愉悅（Prentice 2012）。對女工而言，技術的取得不僅是技術，可以拿來謀生而已，更是開拓世界的方式。

在希臘克里特，小鎮裡有各種各樣手工藝人的工作坊，但這些主要是一個生產而非教學的場域，學習只是附帶。在這個脈絡下，學習過程充滿掩飾與狡猾。Herzfeld發現，徒弟和師傅之間存在必然的張力，師傅怕徒弟學得太快，出去成為競爭對手。徒弟要維持傳統上希臘人自豪的獨立性與主動性，也不願意低聲下氣開口詢問師傅該怎麼做。在雙方互有提防的情況下，徒弟採取的學習方式是偷學。能偷學到師傅的密技，不但取得技能，還獲得男子氣概（Herzfeld 2004）。

2 引自Gregory 在2007年出版的書提到的概念。Gregory, Steven 2007 *The Devil Behind the Mirror: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除了技術之外，拜師學藝還是一個學徒學習「製作自己」的技藝的過程，父母送孩子去作坊除了取得謀生的技藝，還是要讓孩子社會化，在拜師學藝的過程中習得希臘人的狡猾、靈活、冒險精神等，在旁邊偷學（觀察）師傅和客戶之間的互動，學會掩飾，之後也能以表裡不一的方式跟他人互動，這在希臘社會中才被認為是恰當的舉止。生產產品和生產自己的關係密切，掩飾就是強加在人身上的一種工藝，這被當地人視為是美的，學會掩飾自己，就像工匠學會用工藝打磨作品一般（同上引）。

作坊裡的工匠在培養學徒及其身體的方式，緊緊鑲嵌在該地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歷史文化脈絡中，特別深受其宗教傳統影響，這也使得其和西方個人主義意識形態下的教育觀、勞動觀、審美觀與價值觀（如對於獨創性和一致性的看法）都有所不同（同上引）。可說在希臘學徒技術學習與養成過程中，偷學技術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自我的技藝」，亦在打磨工匠的價值觀、處事態度與主體性。

由上面的例子可知，「偷學」本身就帶著工人的主動性，帶來「靈活的」認同，是一種能動性的展現。在工作場所中，工人並非被動接受規訓，他們更像「靈活主體」，主動進行「偷學」。「偷學」能夠帶來愉悅的情緒、男子氣概／聰明感以及「當老闆」的感覺，特別是當師傅或管理者不願意給予學習機會時。此時，學習的動機不僅只是經濟的算計，還是自我構成的一部分（Herzfeld 2004；Prentice 2012）。

偷學也意味「沒有教的學」。在葉門，「偷學」是徒弟的責任，工作中的意義與前提，不會有人教，透過跟著在現場觀察、聽與模仿，徒弟要自己學、自己懂，如果敢膽「越界」從事不屬於其層級的活兒，或做出不合宜的舉止，就會被資深工匠給置換掉（Marchand 2008）。許多技藝要習得也只能透過「到現場」，由學習者自行觀察、嘗試、模仿、領會來學習。研究者Venkatesan在學習紡織技術時，發現僅只有按照順序表列出來的技術步驟流程，是無法學會的，但她又一再被告知，這個技能並不困難，人要學會不需要太正式的訓練。這兩者之間的矛盾讓她困惑。後來她發現，關鍵在於必須要到紡織現場去專心觀察，然後親身嘗試，在知道了身體、紡織機、原物料之間的關係之後，再得到有經驗者的幾個指示，就能夠慢慢學會。因為

「在現場」，知道問題會出在哪裡，又該如何解決，學習紡織技術，就真的如同社群裡的實踐者所說的「很簡單」（Venkatesan 2010：S168）。「偷學」，或「沒有教的學」，又再度要求我們必須正視技術學習本身就是一個「社會過程」（social process）。要學會技術，不能脫離社會。

以上的研究成果為本研究提供了概念框架。技術存在於社會中，學技術帶來了特定的社會互動，學一門技術是學習技術本身加上學習實踐這項技術的社群互動、社會舉止、行業精神、人際法則、權力關係、價值體系與自我認同，亦即學習的不只是紡織，還是成為紡織者，學習的不只是砌磚蓋房子，還是成為石匠。在「去技術化」的生產環境中，去技術的同時也去除其社會性，使人成為原子化的個體，並帶來負面認同。但即使連「去技術化」的生產環境也鑲嵌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脈絡裡，如同千里達女工的例子所示，她們透過主動「偷學」，再度把社會性帶回去技術化的生產環境中。

「偷學」就像「沒有合法的邊緣參與」一樣，我稱之為「邊緣參與」，透過這種沒有合法的邊緣參與，將能使「去技術化」再次被意義體系穿透，重新賦予社會性。

在泰效工廠中研究被「去技術化」的農民工的學習歷程時，我因此除了關注明顯的教學之外，更關注邊做邊學的「合法邊緣參與」與農民工作為靈活主體的偷學過程；除了關注技術本身之外，也關注技術的社會性；除了關注正式的實踐社群之外，也關注「非正式實踐社群」；除了關注學習過程中技術的習得與否之外，也關注在「邊緣參與」過程中學習者如何取得社會身份的轉換。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對學習的所有討論都缺乏移動的面向，農民工「進城打工」除了打工之外，「進城」亦是他們想學東西的重要因素，如何把「移動」納入學習的分析討論當中，是這些理論需要補足之處，本研究將以農民工學習的民族誌來對此做進一步的思考。

本研究的主要田野在深圳的台資電子工廠泰效。³主要田野是在2007-2008年進行，2012-2018年之間進行追蹤田野。泰效廠是台資電子廠，2007-2008

3 工廠名匿名處理。以下所涉及的所有農民工的人名，也都匿名處理。

年間，泰效除了個位數的台幹之外，有大約122名員工，52位是男性，70位女性。員工來自十七個省份，最多來自河南省（共25人），其次來自湖北省（共19人），他們的教育程度多半初中畢業，除了一位42歲的婦女之外。年齡介於16-30歲之間，平均年齡21歲。本研究的資料主要來自於田野與追蹤田野時，透過住在工廠的宿舍以及住在農民工租賃的房屋中與農民工一起經歷日常生活參與觀察得來。我除了參與他們的勞動情形之外，也特別關注他們在工業區的生活節奏以及休閒活動。本研究除了深圳的工廠之外，我也隨一位農民工在春節時返鄉過年，在湖北農村待了三週。雖與整個工廠的基層與中層勞工都有接觸，但為了更進一步的瞭解農民工的狀況，我在工廠隨機抽樣四十個人進行深度訪談，在所謂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下，他們當中僅只有一位是獨生子女，家裡的平均手足數是3.33人，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農村允許頭胎生女孩的家庭，在幾年後可以生第二胎，另一方面也是許多家庭選擇繳罰款生一個以上的小孩。他們的童年有22人是以留守兒童的狀態度過。工廠裡的員工常常是透過熟人介紹進廠的，不是透過親戚，就是透過老鄉，也有透過同事介紹來的，彼此之間除了經濟關係之外，社會關係也疊合在經濟關係其上，彼此形成粽子一樣的網絡關係，因此在工廠裡，第一句話問「你是誰介紹來的」比問「你叫什麼名字」更普遍，透過此就可以很快的知道員工是屬於「哪一群」。這些員工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進廠，通常都是三三兩兩而來，過年前後會有一波比較大的招人動作與晉用潮。

泰效工廠的老闆兼總經理是台灣人，留日工程碩士，曾在業界大廠擔任過重要職位，在相關產業的人脈廣大。他創立此工廠一方面是因相信他的產品在研發上有競爭力，另方面旨在實現他自身的生產與管理哲學。泰效與一般台商工廠最大的不同是，老闆一心想把人力資源「在地化」，因此除了副總與少數工程師管理人員之外，工廠都盡可能晉用中國大陸人士，幹部也從員工當中拔擢培養。泰效工廠與大部分的工廠一樣，勞動力的流動率很高，特別是過年前後總有缺工的危機，這現象帶來了一些社會後果，我在之後的民族誌資料中會再詳細討論。從2007年到2018年，泰效人事更迭，遷廠數次，某種程度經歷許多轉變，但工廠主仍然沒換，開發的產品雖略有調整，也在持續中。有一些當年就在廠裡的農民工，仍繼續留在工廠工作。離開的

農民工，各有各的發展，我也持續追蹤，但因不是本研究的重點，因此暫不贅述。

本篇論文因主要探討農民工的教育與學習的經歷、態度與需求，因此將特別聚焦在農民工進城打工的動機與學習機會的來源上，我關注工廠提供的訓練以及工人自發的非正式學習，蒐集民族誌材料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一）對學校教育的態度是什麼？（二）進城打工想要學什麼？（三）通過何種途徑來學習？與（四）繞開學校之後，向上流動的想像是什麼？我在工廠中也多次參與觀察了廠裡的副總與中間幹部人才招聘的情形、新進員工面試過程，以及進廠之後的報到過程與「上工」（意指上產線工作）的訓練過程，我並參與許多員工在食堂、宿舍的閒聊，加入他們在工餘時的各種活動。

以下，我將先談農民工對學校教育的看法以及為什麼想到工廠學習，其次再談工廠內由官方所規劃的正式學習，最後，則把目光轉向工廠裡「有別於官方計畫的學習渠道」，亦即「去技術化」之外學習的可能性。

二、兩種向上流動之路：教育策略選擇的家內分工

根據我在田野調查時所蒐集的農民工的生命史來看，許多受訪的農民工在讀到初中時，就「決定」不要再繼續往上唸。不往上唸的原因，除了一般想像的經濟負擔不起，或是功課不好之外，農民工常跟我強調，是「我自己決定不要唸了」，他們說「學校學不到東西」，或「想出來看一看」。他們似乎已放棄了學校教育。但矛盾的是，若問到出來打工後賺得錢會如何使用，他們又常把「讓弟妹可以上學」當作原因。一方面主動放棄自己的學校教育，另一方面又寄望家裡的其他手足可以繼續學校教育，到底農民工是如何看待學校教育的？

之前普遍認為中國社會因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教育的目的若不是要培養道德修養，就是要達到社會控制，經濟生計問題很少成為教育主要的關注點（Li 2001），因為教育本身就是目的，透過教育是要培養精英、官員和好公民（Lin and Fan 1990）。Chi和Rao（2003）認為這種結論有城鄉差距。他們

在當代中國沿海的偏遠山區的研究發現，山區農村的父母對教育採取一種務實的態度，他們傾向強調教育的短期經濟利益。對他們而言，受教育就是要獲得有償就業。也因此，不管學生學習表現好或表現壞，只要讀到足以外出就業就夠了，沒有繼續往上唸的必要。不只在中國，Froerer（2012：345）在印度的研究也同樣發現，對於底層邊緣群體而言，受教育主要是要轉換自己的社會地位與經濟狀態，達到向上流動，尋求村落以外的生計機會。在底層人民認為「學習為生存」（Chi and Rao 2003：349）的前提下，教育幾乎等同於向上流動，也是學習唯一的目標。那教育到底多大程度替底層人民滿足了這樣的目標呢？

一般民眾與公眾輿論普遍相信，接受學校教育並取得成功，是窮人家孩子最佳的向上流動策略，但挑戰這種說法的研究成果不少（Bourdieu and Passeron 1990；Evans 2006；Ferguson 2001；Kusserow 2004；Ogbu 1988，2003）。人類學對於農村與部落的研究普遍指出，普及教育並不如我們所預設的必然是正向的、符合人權的，也通常不會直接給農村或部落孩子帶來向上流動所需的資本，相反的，其更常帶來問題，甚至就是問題本身（Bloch 1998；Hsu 1971；Nieuwenhuys 2003；Rival 1996；Stafford 1995）。現代學校教育進入農村或部落，反而造成了「教育」的崩潰，使得原有的傳統文化傳承機制隨之中止（Stafford 1995）。除此之外，學校教育也常常進一步的貶抑原有的知識價值體系（比方勞動方式、儀式、部落傳統風俗等等）

（Anderson-Levitt 2005；Bloch 1998；Levinson and Holland 1996；Rival 1996；Stafford 1995）。可以說，學校教育在農村、部落造成的最大問題是「斷裂」：國家（或是殖民者）透過學校來生產理想公民（Luykx 1999），其與部落或農村傳統文化中所認定的「理想人」往往相互衝突，因而常常把後者定義為落後、需修正的存在。當學校教育夾著國家力量進入地方，又帶來極端不同的價值與知識體系時，就會造成青年學子必須被迫在兩套不能並容的體系中自行尋找出路，而夾縫中的掙扎往往失敗多於成功。

就算農村與部落的孩子真的透過學校教育達成了向上流動的梦想，他們的「成功」也往往帶來與家鄉的疏離，並被迫放棄自己的傳統文化。學校教育代表的「抽象體系」常「脫嵌」於社區與日常生活中，其傳授抽象的、

去地方化的知識，一方面讓人有能力可以到處移動，另一方面卻使人變成地方社會的「陌生人」。這使得學校教育所規劃保證的向上流動路徑，常是偏中產階級的、城市中心的，其面向特定的勞動市場，而與地方社群自行定義的「成功」與勞動市場需求常出現很大落差。在這樣的脈絡下，對非中產階級出身的學生而言，如漁夫的子弟，上學才是一個異化的過程（Corbett 2004）。泰效工廠裡的農民工們幾乎全部成長在中國農村，學校教育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什麼？在進城打工之際，他們又是如何思考學校教育、生計與向上流動三者之間的關係呢？

2008年，鄰近農曆年期間，中國南方發生雪災，正在做田野的我，打算跟著我的主要報導人絲綢回她湖北老家過年。雪災讓火車票更加難買，即使買到，也無法確定火車是否會開。絲綢每天跟我報告進度，不確定能不能回得成，最後她興高采烈的告訴我，她的一個「老鄉」李萬會開車回湖北農村，車上還有三個空位，絲綢、我和另一個廠的老鄉可以搭便車。

出發當天，李萬開著一輛嶄新的Toyota來廠裡接我們，這輛Toyota新車是李萬剛買不久的。李萬曾是個農民工，但現在自己當老闆。他和絲綢是透過網路上的「湖北老鄉群」認識的，絲綢說，他們彼此「聊的比較好」。李萬怎麼從「農民工」變成老闆的呢？在隨後的幾次訪談中，李萬告訴我，他在湖北讀到中專，中專畢業後就進城打工，跟大家一樣，也是從產線基層員工做起。他說打工前，他們家是村子裡最窮的，爺爺眼睛有病都沒錢治，就瞎了。媽媽原本的家境還可以，但是因為腿有殘疾，才「嫁到這麼窮的家裡」來。李萬出來打工前幾年特別努力，一心想要「在我們公社的三十三戶人家裡面，成為表現比較好的」。他後來被工廠「提起來」做採購，做了幾年，認識了一些人，知道了買賣的機制，就自己出來「當老闆」。他的「公司」，其實只有他自己一人，因為他知道貨要從哪裡拿，又知道有誰需要貨，就靠著販賣精密儀器的抽成，賺了不少錢。他新車的後車廂裡，載著一個大平板彩電，是要搬回去給媽媽一個驚喜。他淺淺的笑著說：「在我們村裡開小車的，我還是第一個」。我們一路北上，當車開過武漢大學時，李萬說：「這年頭中國的年輕人，不是進大學，就是去打工，上社會大學。」。

到湖北農村時，絲綢還留在家裡唸高中的堂妹，與還在唸小學的堂弟跑過來迎接我們。堂妹準備要考大學了，卻不太有信心能考上。她講話時總是低著頭，很小聲地說著，不太敢看別人的眼睛，說話也不清楚。後來才知道，堂妹是因為還不太會講普通話，怕講錯，也怕人家聽不懂，所以不好意思大聲一點說話。她在鎮上上學，即使上到高中，老師們上課時也仍然講家鄉話，而不是普通話。堂妹也還不會用電腦，因為學校只有一間電腦教室，一個學期也就只有進去上過一次課，平常是沒機會可以走進那間教室的。相較之下，絲綢連初中都沒有畢業，但講話卻總是很大聲，彷彿很有自信，也可以講得一口雖帶著口音，但相當流利的普通話，用電腦打字也打得飛快。絲綢說，「高中不教講普通話與會電腦（打字），高中是要教你考大學。」

絲綢有一次問我「你聽過百無一用是書生嗎？」，她說這句話是李萬告訴她的。他們私下討論過，我為什麼要唸博士。「讀那麼多書幹嘛啊？」，他們是真心的不解與好奇。李萬認為學校教給他的「專業知識」，現在回想起來，有用的不到百分之二十，學校對他最有幫助的是「薰陶」，在學校裡學會說話應對、溝通能力、獨立生活等能力，對他出社會是有幫助的。至於後來工作所需要的「專業知識」，都是「做中學」逐漸累積起來的。對於農村人而言，留在學校繼續唸書是有風險的，若考不上大學，常常就會落得「什麼都不會」。李萬回想，當年他們初中一班80幾個學生，能考上高中的只有3個，「更不要說進大學了」。後來在工廠裡的訪談，與其他農民工談及學校教育時，他們也普遍認為留在農村學校唸書，希望不大，「要唸就要去城裡唸」。

絲綢的弟弟妹妹在絲綢離開家打工之後，一直繼續在家上學，絲綢的薪水資助他們學費。但弟弟妹妹唸到高中後，也主動放棄學業，他們自覺功課不好，反正考不上大學，現在兩個人都跟絲綢一樣，在廣東省打工。絲綢聽到弟妹輟學的消息，痛哭一場，覺得自己當初放棄學業，辛苦打工的目標落空了，也覺得浪費學費，如果始終是要打工，何不早點開始？

他們的說法彷彿帶出了一個歷史的迴旋，讓我再次看到始終徘徊在教授抽象知識或實用知識，面對教育理念或鄉村現實的農村教育問題。民國初年知識份子間就曾引發農村教育該要「為農」或「離農」的辯論。早期的知識

份子都曾批判「農村教育課程的城市化傾向」，此等傾向反而讓接受教育的農村子弟對於自己的鄉土產生陌生與離異之感，引發文化上的斷裂。就連胡適也意識到教育的基本內容忽略了農村的實際景況，而呼籲「中小學課程設置和內容設計，一定要和當地當時社會的實際需要緊密聯繫，只注重課程的完備，卻不顧及實用，實際上只能培養高不成、低不就的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遊民」。為了修正這些問題，諸如陶行知、梁漱溟、晏陽初都曾經各自發起平民教育運動，試圖改善（莊孔韶與王媛 2011）。這些知識份子發起對「生活教育」的提倡，雖然主張各有不同，然都基於左派的教育理念，試圖翻轉實作／勞動在知識位階中位於底層的位置，強調教育應與（工農）生活相接。如陶行知，便成立了工學團，把生產與教育結合在一起。這些教育運動遺產至今仍然成為當代中國工農教育的思想指導，也對於當代農村鄉村建設運動，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克服教育問題的城鄉矛盾上，中國共產黨曾傾國家之力，扭轉腦力勞動優於體力勞動的看法。在1958年教育大躍進運動中，中國共產黨透過了一系列的教育方針，試圖把「工農群眾知識化，知識份子勞動化」，⁴主張生產訓練必須被列入到必修課當中。為了讓學生依照規定參與到一定時數的勞動中，學校自己辦農場或工廠，工廠和農業合作社也要自己辦學校。學生可以在學校自辦的工廠或農場中勞動，或是到校外的工廠或農業合作社去參加勞動。當時學校除了由教育專家領導的全日制學校之外，還同時並存許多辦學形式。當時推動一種雙軌的教育方針，目標是要「既照顧普及，又注意提高」，被稱做「兩條腿走路」，亦即符合正規制度要求教學質量的學校教育，與符合半工半讀趨勢的大眾教育同時發展。但這個教育運動還是失敗了，其中一個原因是農村人不懂為什麼「要到學校去為勞動生活作準備」，農村子弟很小就開始成為勞動力，輟學為了從事各種不同的農副業的狀況並非罕見，他們納悶如果學校教育不能幫助他們逃避勞動生活，那上學何用？如果上學也是要勞動，而且是做無償的勞動，那不如留在家裡勞動還更有利

4 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是承襲蘇聯早期強調勞動在教育中的作用與重要性的觀念。

可圖。教育應該是要提供向上和向外的發展道路的，如果教育沒有辦法達成這個功能，上學就會被認為是受了委屈或者是一種浪費（Pepper 1987）。這種觀念恐怕至今都沒有改變。對於農民而言，受教育就是要逃離農村勞動，如果有比學校教育更好、更有效及更可行的方法，他們也會傾向選擇它。

在我初進工廠那一段時間，每當向工人自我介紹，總是會有以下的對話出現：「你在唸博士？」，是的。「你來我們這裡待一陣子之後就可以畢業了？」沒有耶，還要回去學校寫論文。「還要回去學校？那要多久才會畢業？」，大概還要個一兩年吧。「還那麼久喔？博士要唸多久啊？」，大概五六年算快的吧。「啊？為什麼要讀那麼久啊？花那麼久時間是要讀什麼啊？」這些對話，一開始我也有點詫異，會反問他們，「要不然你們覺得要唸多久？」，他們會說「幾個月吧」，這下換我很訝異，幾個月就可以拿到學位了嗎？

隨著對他們的學習經歷與脈絡的逐漸理解，我終於可以「了解」他們的「問題」了。會在工廠裡出現的「學生」，在這些農民工的認知裡，通常是為了「實習」。農民工常在初中畢業後唸職校，或是去上培訓課想取得「證照」，這些職校與「培訓課」的課程設計，通常讓學生在學校裡僅待幾個月，之後就以「實習」的名義把學生送入各個工廠中工作。這些學校規定，學生必須在外面工作一段時間後，才可以領畢業證。所以農民工自然也以為我是為了取得「畢業證」而來工廠「實習」的。

由他們的說法可以看出，工廠裡的許多的勞動，其實都是披著「學習」的名義，由同時是學生又是勞工的人員來達成的。學校把應該負擔的教學責任，以「實習」的名義轉包出去，讓工廠來承擔，但同時，工廠方作為生產單位，也不認為自身有義務要「教」什麼給工人。讓「學習勞動化」美其名是要結合知識與實踐，但教學的部分就在這樣的「轉包」之間消失了，徒剩勞動。這樣的經歷，在工廠裡屢屢聽見。職業學校變成勞動力仲介所，還能以打廣告保證就業。工廠需要穩定勞動力，也樂於透過此等管道來獲取。⁵

5 泰效工廠本身並不跟職業學校合作，因此這些農民工在職校唸書卻到工廠「實習」才能拿到畢業證的經驗，都是發生在進泰效之前。

當然，這並不意味農民工就完全揚棄了學校教育。農民工對於學校教育的態度基本上是務實的，唸書的目的是要幫助他們逃離農活、向上流動與改善生計，他們認為自己沒有必要繼續唸書也是出於同樣務實的考量。在他們身處的特定年代，外出打工看似比學校教育所勾勒出的道路，更有機會為他們提供逃離農活、向上流動和轉換身份的機會。

但同時，農民工們也知道學歷與文憑在社會上仍然有很大的用處，於是，他們以家戶為單位，來安排教育的選擇：自己放棄讀書，透過進城打工來向上流動，但希望能讓其他家人去讀書，走學校勾勒出的向上流動道路。他們負責賺錢，提供家人學費，可以到比較好的學校專心唸書，提高考上大學的機會，或是希望自己某一天當上老板，讓下一代能進城到更好的學校讀書。我把這種以家戶為單位所做的教育決定，稱為「教育選擇的家內分工」。

之前人類學的研究指出，移動的決定是要以家戶為單位來理解，視之為一整個家戶所採用的策略（Valentin 2012）。在農民工的案例中顯示，不只移動，連教育選擇都是以家戶為單位在做決定，要理解農民工的教育決定，必須從「家戶」為單位來理解，而不是以個人為單位來看。許多關於移動、學習與生計策略的研究都不約而同地指出行動者會盤算著可取得的正式與非正式教育資源，並靈活的結合兩者，去達到向上流動的結果（Froerer and Portisch 2012）。在農民工的案例中，靈活結合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的單位不是個人，而是「家戶」。若學校教育所提供的向上流動之路，要透過抽象知識的學習，中產文化的模仿，進城打工則提供了另一種向上流動之路，倚賴實用知識的掌握與經驗的累積。農民工的例子裡，他們在這兩種向上流動之路中進行了家內分工。「向上流動之路的家內分工」試圖以家戶為單位來兼顧學習中的兩個面向：實作與概念、經驗與文憑。對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而言，學校教育對他們而言，反而更像是向上流動後的勳章，而非前提。他們普遍希望賺了錢後，就可以去「買學校文化」。⁶

6 例如一個很想當老闆的雲姐，常不只一次對我說，只要她當了老闆，就要請我（亦即一個看似在學校教育體系內成功的博士）當顧問，她絕對不會虧待我的。

若「向上流動之路的家內分工」期望農村家戶內的手足採用不一樣的教育策略，那選擇離開學校，抱著學東西的希望進入工廠的農民工，當他們想像進城的「學習」可以幫助他們繞過體制，闖出當老闆的向上流動之路時，究竟在這一趟旅程中，經歷了何種「學習」？

三、把農民變工人：強調規矩、反覆訓話與去技術化

泰效工廠主要的產品是電子連接器及RF系列產品（RF Header、RF plug connector、RF Switch等）。工廠廠房最初是在深圳松崗，後來遷到龍崗廠區，2018年時又再度遷移到公明的工業區。工廠廠區是一個封閉式的方形，三面建築物，分別是車間、辦公樓和宿舍與食堂，另一面是大門，門口有24小時的警衛看守。2008年，生產線上的普工工資大約在700-1500元。一整個月做滿22天都不請假的話就能拿700元（基本工資650元加50元全勤獎勵金），加班的狀況下最高可以拿到1500元／月，有技術的工人（如能操作立式成型機的）也會比較高。管理幹部的薪水大概在1500-3000多元之間。2018年，基本工資調高到2130元，產品略有調整，連接器的部分不做了，專門生產RF產品。工廠內每日的生活作息安排是早上七點到八點在食堂吃早餐，八點開始工作。上午從八點工作到十二點，下午從一點半工作到五點半。假如需要加班的話，則從晚上六點半開始工作到九點半。工人工作時間都穿工衣帶工帽，用不同顏色的帽子區分部門。生產部將工人分成三到四組，處理不同任務，各組組長會在車間走動巡視，監督工人的工作狀況。

工廠內為新進員工安排各種訓練——或許我們可以將之視為工廠內官方版本的「正式學習」——這些訓練的目標是要趕快把一群農民，或說農村來的畢業生，很快的訓練成有產值的工人。在泰效對新進員工的訓練中，一直反覆出現且重複被強調的是「規矩」。對於管理人員而言，這是能確保農村勞動力可以很快產出生產力的關鍵。我試圖透過一個新進員工所經歷的流程，來闡釋工廠內如何透過訓話與規矩，把「農民」很快地轉化為一個有產值的「工人」。

我的田野筆記描述了新進員工進廠的情況：

今天又有四個河南人進廠，他們宣稱自己是廠長介紹的。郭姊（生產課長）去面試，我跟著去聽。這四個人都是親戚關係，其中有一個是老員工，之前在這裡做過，過年前辭工回家，說想在家待久一點。但是不到一個月，過年後又回來了。這個媽媽大概三十五歲左右，跟郭姊差不多，他帶了一個十七歲的小男孩，一個二十三歲左右的男孩，這兩個男孩是叔姪關係，還有這個二十三歲男孩的媳婦。

郭姊面試他們時，主要還是針對兩點在反覆琢磨著，第一點是針對那對夫妻。「兩公婆都在同一個工廠裡工作，不要兩個人鬧脾氣就在工廠裡打架吵架，不能把私事帶到公司來」郭姐強調。第二點是針對小男孩：「才十七歲，第一次打工吧，工廠很辛苦的，你受的了嗎？我會天天罵你的」，那個小男孩邊笑邊點頭說：「受的了」。旁邊的媽媽陪笑著說：「大姊人很好的，怎麼會罵你呢？」

即使僅在面試過程，郭姐已經開始在灌輸工廠內的幾個規矩與價值了：不能鬧脾氣、不能打架吵架、工廠很辛苦，被罵是常態，要能受得了，否則現在就可以考慮不要幹。

我參與過好幾場面試，過程類似，幾個要點可以大致總結如下：首先，生產課長郭姊會先確定應徵員工的基本資料是不是作假，防止有些人會因年齡不足拿家人的身份證來打工，或是用假的身份證。郭姐會先看身份證上照片像不像，請他們背地址、出生年月日跟身份證號碼等。但普遍來說，來應徵的農民工都不太記得自己的身份證號碼，郭姐也就算了。如果身份證是剛換的，照片又差很多，郭姊就會反覆質疑。如果身份證是很久以前的，照片有差異，郭姊就相對比較可以接受。（二）郭姐接著會問有沒有工作經驗，如果是第一次出來打工的孩子，就會跟他們強調打工很苦，問他們為什麼不珍惜讀書的機會，強調現在這社會還是很重視學歷的，通常農民工聽了只是

笑笑不回應。（三）如果是有工作經驗的，會問之前的工資多少，如果工資比這裡高，就會問為什麼不留在那裡。如果不是作普工，而是作QC（品質檢查），就會繼續問她／他工作流程。（四）如果是女性，結過婚有小孩的，會問小孩在哪裡，由誰帶，會不會牽掛小孩。告誡並確認不能／不會讓牽掛小孩影響工作。（五）如果女性應徵者是已婚的，會問老公在哪裡，如果不在一起，會問那該怎麼聯絡，是否會影響工作。如果在同一個廠，會警告他們不准把私事帶到辦公室裡來。（六）會強調不管是誰介紹的，在廠裡都一視同仁。（七）會說「讓我看你們的手，動一下我看看」（要確定手腳是否夠靈活），牆上還有一個視力測量表，郭姐有時候會要求量他們的視力（組裝零件是否能夠看清楚零件）。（八）最後會宣布，要服從廠裡安排，遵守廠裡規矩，說明廠裡薪資狀況，一個月的薪資金額是包括全勤獎（勤工獎）在內的，如果員工在這個月中請假半天以上，就會失去這樣的獎金。郭姐同時嘔宣佈廠內的獎懲制度，第一次書面警告，第二次開始就記小過，扣一天的工資，最多可以扣到九天。如果被記大過，就解聘。最後，郭姐會再強調一次：「我對新員工沒有什麼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一要聽話、二要服從安排、三要遵守廠規廠矩，就這樣」。

透過這樣的面試過程，廠方欲求的「好工人」的主體形象已然呼之欲出：合法、誠實、學歷不高、能吃苦耐勞、手腳靈活、視力好、願意服從、不靠關係等。對於女性員工，如果已婚，則要確保她們的家庭責任已經有所安排，不會影響她們在工廠裡的工作，情感上也能不過度牽掛孩子、家人。對於男性員工，則要確保與他們與另一半的關係是和諧穩定的，不會把私人事情帶入工廠。至於這些條件的首要、成為「好工人」的關鍵，是郭姐最後宣告的：聽話、服從、遵守規矩。

面試通過之後，生產課長就會請總務給新進員工發「工衣」（工廠制服），帶他們到宿舍去安頓，下午再來報到。報到後，新進員工馬上就被帶到產線上工，看哪一組缺人，符不符合需求（比如性別或是技術），接著就把新到的人員隨機的分配到產線上，交給資深員工「帶」。

「帶」新進員工多半由班長親自來，或是由班長選擇有經驗又做得好的員工來帶領。新進員工會被帶到某一個工序的工作站，正如同「去技術化」

理論所說，工廠裡的工作流程已經被拆分為一個個連貫的碎片，由每個工人負責一小塊工序，靠著重複與簡單化來增加效率。雖然每個工作站前都會吊掛著裱上壓克力框的SOP標準化操作工作說明書，但員工們通常不照著那個做／學，以下是班長「帶」新員工操作的教學過程的觀察：

一個員工指著SOP對班長說「拿讓她（指新進員工玉環）看一下她就懂了」，班長應道：「看那個怎麼會懂，你要拿給（線材）她看。」於是他們給玉環看線材，指著實際的線材解釋這線材該怎麼看才算合格：如白色線要跟白色線配在一起，黑色要跟黑色，如果白色跟黑色在一起就不對了。如果皮太長就要把它剪掉，還有哪裡是最容易有問題的，叫她特別注意。最後他們提醒道：「喔對了，你看線的時候最好這樣擺，線才不會纏在一起。」又說：「你如果有不確定的，就問一下」。

新進員工上工時培訓的重點可以摘要如下：（一）操作方式會強調身體的動作，提醒新進員工要注意哪些身體的細節。（二）班長會先做一次給新進員工看。模仿是主要的學習方式，語言僅僅是用來提示一些訣竅。（三）班長做了之後，會要求新進員工：「你作一次給我看看」。在員工親手做的過程中，班長去發現問題。（四）根據員工操作時的動作，錯，班長再提出糾正，並決定下一步教學如何安排。

班長通常都是年輕的農民工被「提起來的」，像花花，十七歲的湖北人，常都很有耐心的指導新進員工，要新進員工不用急，慢慢做，還會溫言提醒他們不要讓自己太累。花花說：「當初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的，剛進來的時候，總是很笨，熟了就好了」。這種「帶」的關係通常只持續一小段時間，之後就依照現場的需求來調度人力，當初帶你的人也不見得可以繼續帶你，兩者關係與所謂的師徒制差距甚大。雖然沒有師徒制之實，但有些員工在這樣「帶」的過程中會與班長、組長等管理人員產生情感，暱稱他們為「師傅」，有時候私下繼續請教，或是維持持續引導的關係。

新進員工過幾天之後，就會被召集到辦公室上職業訓練課程，第一堂課

是上工廠裡的制度與規章，諸如上下班實行打卡制度、請假制度、嘉獎與懲罰制度、作息時間、宿舍規定、外宿規定、物品放行條與外出放行條的規定等等的。上完課之後要考試，新進員工必須通過這個考試，如果沒有通過，就要直接接受同一份試題的測驗，直到通過為止。通過考試之後，基本上就算是被承認的員工。

泰效工廠為符合ISO9000的要求，員工入職之後還會接受一系列的教育訓練課程。這些教育訓練課程包括「專業」、「管理」與「品質」三個面向。專業是工廠生產的產品的相關知識，諸如產品的特性、功能、研發的進度等等。還有一些操作上的技術性細節，諸如「線材組裝基本工藝流程」、「大線組裝上板講義」等等。品質部分則會跟員工介紹ISO9000系列的質量管理體系標準。管理課程內容則包羅萬象，教材包括Toyota的成功案例分析、推廣灌輸「新公平精神」的「啟示錄」、強調中國發展潛能的「中國不強都不行」、還有輔導員工戀愛情緒管理的「前世欠你一滴眼淚」、「很愛很愛你」，以及強調EQ的重要性的「脾氣」、「自我管理法則」等等。

如果沒有趕工的話，工廠會定期辦全廠的大聚會。該聚會把所有員工召集在一起，坐在食堂裡，聽工廠主與廠長講話。在這樣的場合，工廠主會先描繪工廠的發展遠景，之後由廠長負責跟所有的員工強調規矩的重要性。比如說，廠長說：「工廠是家庭跟社會之間的中途站。家庭，是沒規矩的地方。社會，是講規矩的地方，而工廠訓練你知道什麼叫規矩。」這樣的談話會反覆出現多次。

生產課長有時候也會把整個產線的工人都聚集起來，進行精神訓話。她的開場白往往是「新進員工多，很多是第一次離開家，不知道廠規廠矩，車間氣氛亂，老員工要做好榜樣。」接著便開始提醒員工要「注意儀容，工服、帽子、廠牌。頭髮要全部放到帽子裡面去」，男生「頭髮太長的，這個禮拜日去剪」、「離崗時間確實登記，上廁所時間不要太久」、「對打掃阿姨講話要客氣，不能大呼小叫」、「坐要有坐相，不能蹺腳，搖腳」、「宿舍要打掃，男生宿舍很髒很臭」等。

像這樣透過「集體訓話」來反覆強調規矩的場合還很多，除了廠長、生產課長不定時聚集工人訓話之外，生產線的員工還會每天至少會經歷兩次

以上的組長訓話。「訓話」幾乎是工廠的日常韻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天每一個輪班下班時，鐘聲會響，作業員要聽到鐘聲後，才能停止動作，起身。若有些作業員還在動作，此時所有人都還不能離開崗位，必須等全部人員動作完畢之後，再排隊集合站好。班長這時候會面向隊伍，站在大家面前，開始訓話。等到班長把要宣布的話講完了之後，會說：好，大家吃飯吧，從這邊先走。然後大家再一起下樓到餐廳吃飯。此時會有兩個人留下來打掃。打掃的人由班長分派，輪流值日，該日兩位值日生，就要晚點吃飯，吃飯前先拿掃把把工作場所地板上的紙屑灰塵掃乾淨。班長也不能離開，必須留下來等值日生作業完畢之後，最後再走。

班長訓話的內容，大部分是（一）與常規有關。比方說：提醒新進員工，廠牌要掛好，帽子戴的時候要把頭髮都放到帽子裡面去；不要在廁所裡面講電話；男生不要在廁所裡面抽煙；宿舍清潔，如「男生宿舍已經住滿了，人很多東西雜很亂，下班以後，要記得打掃乾淨，注意宿舍清潔」；離開離開工作崗位去上廁所的時候，一定要配戴離崗證。因為每組的離崗證只有一張，意味著一組一次只能離開一個人去上廁所。（二）有些是與工作進度有關：班組長會宣布這個工段的工作狀況，如果實際產量與預期產量差太多（動作太慢），或是良率很低，報廢率很高，他們會在訓話時要求員工多加注意，並提醒應該如何改善。（三）有些是與獎懲有關：如果該工段的進度很順利，班長會謝謝大家的努力（但從來沒有特別去獎勵一個人或懲罰一個人的時候），（四）有些是與安撫大家情緒有關：有些趕工時候，只有一組在加班趕出貨，這一組的員工做得很累，心情不好，班長（有時候組長也會來）會藉著訓話時間，跟大家鞠躬，說：「大家辛苦了。看大家這樣累，我也很不忍心」。

簡言之，廠裡需要「好工人」，但在去技術化的生產模式中，廠方對「好工人」的要求已經與技術學習和提升無關，把農村人轉換成有生產力的工人最重要的關鍵，是透過訓話和強調規矩。管理方相信農村人雖然「吃苦耐勞」，但也還帶著「農村人的懶散」，不用規矩去要求他們，他們的產量就無法提高。另一方面，工廠要求集體生活，廠方認為農村人不懂規矩，彼此相處時，常造成管理上的問題，製造額外的管理成本。例如舉止粗魯，會

對打掃廁所的阿姨大吼大叫；不注重衛生，宿舍常很髒很臭；或是粗心大意不懂替人著想，盛完飯的時候，飯杓隨便丟，讓下一個人拿到沾滿飯粒的飯匙；也貪小便宜，打飯的時候，因為不用錢，就打很多很多，然後吃一下覺得飯菜不好吃，就又倒掉。總經理就對我說：

農村人不知道如何與人相處，不知道什麼叫做團體生活，不會跟人溝通，什麼事都很直，只想要滿足最基本的慾望，想不長遠與周到，這些常會帶來工廠內的衝突，而降低了生產效率。

農民工也認為自己確實是「粗」，但不是粗手粗腳的粗，而是粗心大意的粗。農村人並不是不會為別人考慮，而是還不知道如何跟工廠裡的其他人應對。在新的工作與生活空間中，他們不知道要如何定位這些一起共事、朝夕相處的陌生人。若對熟人要友善，對陌生人要防範，工人同事們是熟人還是陌生人？又，在家裡當然會打掃房間，但在公共場合就不會打掃，宿舍空間，是要當作家裡還是公共場合呢？

簡言之，「好工人」不在於技術訓練與提升，而是在重塑主體。在工廠日常生活韻律中，看似日常瑣碎、無關緊要、反覆出現的訓話，可以說是一次次去重新塑造農民工的主體、調整他們「個人和群體」關係的「微社會工程」，因為「去技術化」的工作環境，還需要「重新社會化」的主體來配合。

能很快達到要求的產量，又能隨勞動市場的供需波動來去，或許是官方計畫賦予農民工的腳本。但農民工自身對於這一趟旅程，顯然懷抱其他的希望。對於工廠裡的種種訓話，農民工明顯只是心不在焉的聽著，並用能滿足最基本要求的方式，遵守著這些規矩。他們彷彿也「看穿」了工廠教育訓練的目的，並明白這終將只會為他們向上流動路徑帶來阻礙，那他們又是如何透過其他方式去「繞開」並「修復」這樣的情況呢？

四、去技術化之外？生產環境中的學習

從家鄉千里迢迢移動到深圳工廠的青年農民工，若一直停留在「聽訓話、做生產」的「好工人」階段的話，他們會抱怨。農民工抱怨的方式是說：「這學不到東西」，然後開始打聽、盤算著跳槽的可能。那到底什麼是農民工所謂的「學東西」呢？他們想學什麼？又要怎麼學？什麼樣的工廠環境會被他們認定為是「能學到東西」的呢？

根據我在田野中的觀察，我歸納了四種農民工認為可以「學東西」的渠道，並在下方一一討論：一是「見世面」，二是「被提起來」、三是「學做老闆」、四是「遇見貴人」。「見世面」是普遍每個農民工都會經歷的，其內涵及後果較為普遍，對應的場域是農村社會，而後「被提起來」、「學做老闆」、「遇見貴人」則是個人突破「去技術化」障礙，在工廠內「偷／得到」學習機會的方式，農民工試圖用之在城市中取得向上流動的生命機會。

（一）「見世面」

「見世面」是一種跟「進城」高度相關（而「打工」只是個進城管道）的學習型態。這個詞經常從農民工的口中說出，卻鮮少有研究者認真研究其意涵。對農民工而言，「見世面」無關技術學習，卻是打工過程中相當重要的社會學習。這種學習是以農民工的移動、旅行為前提而發生。若缺乏從農村到城市這個移動的要素，打工就只是勞動，而不會有「見世面」相伴而生。我將透過這一節對「見世面」的分析來闡明「離開」與「到現場」，在學習上的重要性，並主張這可以幫助我們更細緻的去理解移動與學習的關係。

農民工踏上離開家的路途之際，家鄉裡的人，包括他們自己，都期待這一趟旅程會為他們帶來（向上流動的）改變。但並非每個農民工都可以順利當老闆，但即使做不成生意當不了老闆，至少，他們會說，出來「見了世面」。

移動到他處去尋求機會或是達到發展的目的，在許多社區中，早被認為是一種學習形式。特別對於年輕男子，移動常被正面表述，當成是一種檢

證成年的考驗，是男子氣概的證明（Noy 2007b；林育生 2014）。在阿拉伯中部山區和伊朗城市之間移動的男性移民，他們必須在一定時間內證明自己有能力面對困難，能夠在流動和臨時的工作環境中以很少的金錢生活（Rao and Hossain 2012）。移動也被認為是生命的必要階段，能擴大青年的社交網絡，超越親屬關係和鄰里關係，因而被認為是通往成年不可或缺的過程（Monsutti 2007）。位於茶馬古道上的雲南和順，鄉里的年輕人被期待要有能力「走夷方」，年紀一到便要跟隨馬幫到緬甸做生意，待闖出自己的事業之後，再回來蓋房子修祖祠光宗耀祖（Fang 2010）。Munn指出透過外出移動再回來，是讓一個人可以進入到原社群的價值體系去產生榮譽的一種方式，在家自給自足並無法獲得聲望。想追求聲望、名譽與價值，便要有故事可以說。一個人一定要外出「冒險」才行，那些拒絕外出的人，則會被負面表述，認為可能是中了巫術（Munn 1992）。

年紀到了，又不離開農村的人，在當代中國也會被負面表述。泰效的農民工告訴我，在他們這個年紀，若沒有繼續上學卻還留在農村的話，常會被說閒話，如說他們「懶」、「在家玩」。那到底農村社會對於外出打工的青年有著什麼樣的期待呢？大致可以從「看得到的」、「可以說的」與「能拿主意的」三方面來講，這幾個層次與見世面的深淺程度有關。以下，先說看得到的。

農民工每次回家，留在家鄉的人都等著「看」。像李萬過年開著車回去，車上還載著一個平板大彩電，親戚來拜年，一眼就看到。這就是「看得到的」。對女孩子而言，看得到的通常是等同於「變漂亮」，變漂亮的女孩子，才像有進過城。泰效老闆喜歡宴客的大飯店裡，有個做足療的的服務員告訴我，她本來在工廠裡工作，待遇也還可以，活兒（勞動量）也應付的來，她也做到了班長。但每次她回老家，家裡人都笑她，「怎麼去了城裡，既沒有變漂亮，不會打扮，也沒有比較會講話呢？你真的進過城嗎？還是個農村人啊」。她覺得非常羞慚，也受不了每次都這樣被嘲笑，在一個機會裡，她認識了足療的老闆，就決定從工廠離開，改作足療。現在她「交男朋友了」，也在酒店裡面認識一些能教她「打扮、化妝、穿衣服」的同事。對她而言，之前的工廠還是像農村一樣，產線上認識的人也都是農村人，現在

終於看起來像「進城」了。

為了讓自己看起來像「進過城」，一個二十六歲湖北來的產線班長李逸會在下班後，花錢去外面補習班報名專門美妝課程。李逸做事是公認的幹練，但她一直擔心自己會大齡未婚，所以決定先改變自己的外貌來增加機率。基於相似的理由，許多農民工穿高跟鞋是在工廠裡學會的。一個人開始穿了以後，其他人就開始學，於是產線一群女工就相約著一起在車間裡練習穿高跟鞋。向來帶著陽剛氣質的阿珠，在一次外出逛超市時，跟絲綢一人買一雙高跟鞋回來，接著好幾個月，她們每天穿著高跟鞋，在產線旁歪歪扭扭的走著，學著如何穿高跟鞋又能走得穩，走得好看。後來阿珠先學會了，可以走得又快又直，走得比絲綢要好，她非常驕傲，到哪裡都穿著高跟鞋。有一次我們出去吃宵夜時，絲綢跟阿珠都穿著高跟鞋，絲綢走回來時覺得腳痛到不行，就乾脆把鞋子一脫，拎在手上，赤腳走回工廠。

我也常受邀陪工廠裡的女性農民工逛商場，他們喜歡在工餘時間逛附近商場挑衣服。選購衣服時，愛挑一些流行的，好看的，自己穿或是拿回農村送人。他們也開始學著認品牌，慢慢數得出來哪些好，像愛迪達斯、耐吉等等，這些在他們心目中是名牌，工業區的商場裡常常可以看到專櫃，一件衣服幾乎就是他們月工資的三分之一。這些採購不單純只是基於滿足慾望的消費行為，裡面還有許多符號意涵。消費不只是消費，還是跟深圳這個城市符號連在一起的消費。他們買東西，像是在採買朝聖後的紀念品，用物質來證明他們來過深圳這個與北上廣（北京、上海、廣州）齊名的大都市。

女性農民工也流行花錢去專業照相館拍照。這些照相館會提供漂亮的衣服、幫忙化妝打扮，讓相片中的人看起來跟平常不一樣。這些照片，在台灣副總眼裡看起來「俗氣」、「過時」，常罵這些農民工浪費。農民工總是默默地聽著，也不回話，但仍然計劃著回家前要找時間去拍。

至於「可以說的」，是指回到家鄉以後，讓農民工「有故事可以說」的那些事。其一是他們會把握機會去經歷、體驗一些他們感到特別的、新鮮的玩意兒，比如吃一些家鄉沒有的東西，玩一些電視上才看過的時尚活動。有假期時，或是不用加班的晚上，農民工會去附近的商場拍大頭貼、跳舞、溜冰。2018年，我再回去時，農民工則流行先去吃飯喝啤酒，再去裝潢豪華

的KTV唱歌，每每唱到一兩點，隔天一樣早上七點上班。廠線班長如果想要激勵員工，最好的方式就是說要在產量與質量達標後，請他們去溜冰、跳舞或是唱歌。對於農村青年而言，能去嘗試些農村沒有的活動，又不用自己付錢，是很大的誘因。農民工也總計劃著在離開深圳前，去深圳著名景點如「世界之窗」、「錦繡中華」等拍些照片，但卻常因為門票太貴就做罷。

其次，「可以說的」還意指可以在回家時說出「在深圳，人家都怎麼樣怎麼樣……」。因為到過深圳，就有這樣的「底氣」（意思是自信）可以說這些話。比方說深圳的房子都如何如何，才不是像家鄉裡的這樣，深圳賣場是怎麼樣的，在深圳煮飯是怎麼煮的，廁所如何，街道怎麼樣安排，家裡面都常怎麼佈置，有什麼雜誌、電視劇好看，深圳理髮店裡面是怎麼洗頭的等等，這些都是外出打工之後回來「可以說的」。過年期間，家鄉的年輕人聚在一起，這些有進城打工過的青年，就成了談話的中心，那些沒去過的人在這種場合，沒有辦法插上話，只能聽著人家爭相描述那些大城市裡的事情。

最後，「可以說的」也意味著「能說話」。能說話除了能以普通話流利表達之外，也代表不怕生、不羞怯，並能「得體的」說話。許多剛進廠的農民工非常安靜，問他們十句，他們大概回答一句。但在工廠待比較久的農民工就不一樣，甚至會主動來找我聊天，即使如此，他們仍會強調這是一個打工後的轉變，例如絲綢就對我說「以前我也很內向，出來這幾年讓我比較會講話了，以前我也是都不講話的，訓練出來的。」絲綢補充，她剛到上海時，同事都喜歡跟她開玩笑，「說我說一句話至少要講三遍，別人才聽得懂，因為聲音太小了，而且說話都喜歡低著頭，一說話就臉紅，那時候因為怕自己說錯話，不敢說話」。為甚麼講話這麼小聲呢？絲綢說「因為因為那時候自己表達能力太差了，不知道自己所用的語言方式，別人是不是能明白」。能說話也不只意味著不害羞、自信地與陌生人應答，還是學會一套「大人」的說話方式。一個十七歲的農民工晴晴曾說，在家她「可以說孩子話」，在外面打工，接觸的都是大人，她「必須學會像大人一樣的講話」。

絲綢回家之後，在跟家人互動時，因為她在上海、深圳打工十年的經歷，某種程度賦予了她一種權威感。此時「深圳怎麼樣怎麼樣」比較少是絲綢自己主動說的，反而是遇到事情時，父母會主動詢問：「要怎麼做

呢？」，這讓「可以說的」，從一個說故事的、新鮮有趣的層次，上升到擁有話語權的層次，我把這個叫做「能拿主意的」。

我們回去第一天，絲綢家剛蓋好了新房，裡面空空蕩蕩的，什麼傢俱都沒有，我們晚上連床都沒有得睡，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們就上街買床，我們在縣城街上一家家走訪傢俱店，去看他們的貨色。我很快發現，絲綢是主要的決定者，有些店，絲綢看了一眼，就嫌質量不好，全家人就跟著絲綢走了。即使絲綢的父母也賣過床上用品，對「席夢思」等名牌的品質與價位很有概念，但到了最後決定時，父母總是詢問絲綢的意見，等著絲綢做出決定。在湖北老家過年的這一段時間，我發現絲綢「能拿主意的」事情還不少，比方說父母買了一個新的煤氣灶，替換以前生火煮飯的灶。東西買了，卻不會用，他們自行搞了半天，還是行不通，只好來求助絲綢，絲綢正在睡覺，心情不怎麼好，起床弄了三兩下，倒也看出了關鍵問題，把煤氣爐給接好了。我問絲綢怎麼會用？泰效工廠裡也不見有人用過這個東西，她說「看過的，打工這麼多年，有機會見的」。

「能拿主意的」還包括知道那些「從來不會明說的」社會百態。見過世面的人知道那些課本上不會教的「社會現實」，對人性、性及暴力有一個洞察。比如他們會知道老闆說的，常常和他心裡想的不一樣；知道男女之間的「那件事」意味著什麼；也知道如何與人協商、競爭與合作，在陌生的環境裡能存活下來。就像愛琴說的，「打工幾年，會比較成熟」，這種成熟意味著知道社會現實，亦即能明白人心，可以知道即使是陌生人，他們在什麼樣的處境下大概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而自己又應該如何應對。這些「社會現實」的話題，也是農民工在工餘時間最喜歡討論的。他們會講述著身邊的人經歷到的、看到聽到的，並討論這些人為什麼在那些時刻會做那樣的事情，看穿人行動背後的意圖。

「能拿主意的」基本上體現在一種能在城市和農村兩個不同的脈絡中皆能找到安身之處的能力，有這樣的能力之後，就能承擔責任。不像學校，會把成功的學生帶離農村，變成「陌生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離家並沒有把他們變成陌生人，而是把他們變成「道德人」。Pine (2014) 曾指出移民工作本身就帶著道德性，在此也是如此。一方面，勞動肯定了自身的價

值，又使人能夠承擔起照顧家人的責任。在城市的農民工，要負責把家鄉的人「帶出去」，為家鄉的人在城裡介紹工作，在他們進城需要時給予幫忙。回到家後，他們則負責為家裡的事情做決定，拿主意。見過世面「能拿主意的」農民工像一道橋樑，既能與生人應對，也沒忘記與熟人的責任。他們知道如何在熟人社會中安守角色，又能在生人社會中精明求生。他們因而能承擔責任，他人（家人）也願意賦予他們做決定的權力，這是「當老闆」的重要能力。

春節假期我跟絲綢返鄉時，她穿了一件薄薄的皮夾克，穿在她身上很好看，但對於零下的氣溫而言顯然是太冷了。絲綢不在乎，她說她不冷，那幾天都穿著那件有型的皮夾克在村子裡穿梭拜訪親友，一路招呼。絲綢在家裡的樣子與在工廠非常不一樣，回家後儼然一家之主，吃飯時總坐在主位，爸媽什麼事情都要與她商量，大到房子怎麼裝修，傢俱怎麼買，房貸怎麼處理，小到煤瓦斯爐怎麼用、菜怎麼炒，都是由她在作主。回家後的她，有一種我在工廠裡沒有見過的權威感。聊起回到家鄉的心情如何，絲綢反覆跟我強調「已經不習慣（農村）了」，「我跟親戚都不親，我跟（城裡認識的）朋友比較好」。還有一次，她特別跟我強調「我跟你是一樣的」，「你就不要拿我工人比了吧」。她不認為自己是「農民工」，或是「農民」。即使只有小學畢業證，中學都沒有唸完，仍然在工廠「打工」，但絲綢一直要我看見，她出門打工十年的經歷，已經「改變了她」。即使她和基層的、剛離家的產線工人都是「農民工」，但這十年的經歷，已經讓她自覺「身份已經不一樣了」，若這不被承認，「那我這幾年的努力都算什麼？」

在現行的戶籍制度下，農民工幾乎不可能真正成為「城市人」，但「見過世面的」他們，帶著「看得見的」、「可以說的」及「能拿主意的」的資本，卻很大程度的提升了他們在原社群的社會地位。

Lave (1991) 的「合法邊緣參與」在此不足以解釋農民工的「見世面」，因缺乏移動的面向。鑄造「學徒式朝聖」(Apprenticeship Pilgrimage) 這個概念的兩位作者Griffith和Marion，他們試圖捕捉旅行到特定地點本身就是取得專業知識與社會身份的必要條件的現象，對於解釋「見世面」更有幫助。學徒式朝聖勾勒一種把走出去、學習與實踐三者融合在一起的旅程，強

調走出去與發展專業技能交織在一起，這個概念可以幫助釐清走出去與身份轉化、移動與學習之間的關係，也把觀光、玩樂與學習結合在一起。晚近對於「朝聖」的研究，已把朝聖的定義放寬到包括宗教與非宗教的旅行，將朝聖定義為「是一個人為了尋求他／她相信能體現其價值理想狀態而踏上的旅程」（Griffith and Marion 2018：9）。在越來越世俗化的世界中，很少有人會進行傳統宗教式的朝聖，但越來越多人因為追求自身的意義而走上旅程。除了出於個人選擇的靈性朝聖之外，還有作為「通過儀式」的朝聖。這常被視為是教育或是社會化過程中「應該做的」一部分，個體會覺得有一種強制性必須去經歷這趟旅程（同上引：xviii，xix）。

「壯遊」（Grand Tour）與背包客在研究中都被視為是世俗式朝聖、或是世俗化的通過儀式（a secular rite of passage）（Kaelber 2006；Noy 2007a）。即使我們常會去區分，有錢年輕人的「壯遊」是純粹為了自由、愉悅或是學習，貧窮年輕人的旅行是工具性的為了滿足經濟需求，但在回顧了徒步旅行的歷史之後，Adler（1985）認為這樣的區分忽略了兩者之間的相似性。貧窮青年的徒步旅行背後的動機，可能是跟貴族青年的壯遊相當類似的：「旅行做學徒」成為歐洲同業工業普遍鼓勵年輕人參與的儀式，其讓貧窮青年一方面滿足西方文化對於通向成年必須要與父母和家分開的要求，另方面也給予年輕男人一個同時可以去觀光、探險並受教育的機會。甚至，Adler發現，在窮人或工人階級的旅行體系中，準備好上路旅行常被視作等同於是「準備好可以工作」（Adler 1985：338）。進城打工可以說是青年農民工混合「壯遊」（grand tour）與「徒步旅行」（tramping）的實踐。他們在青年時代，藉著打工來旅行，一面賺取路費，一面學習工作的能力。

農村青年外出打工時，常對於地點有所選擇與偏好，即使一樣是進工廠打工，他們偏好到中國沿海大城市甚於在家鄉附近的省城，偏好外資廠甚於台港陸資廠。地點對於青年農民工的打工旅程是重要的，他們心中對於中國的大都市有一個排序，到過排序比較高的城市打工，到外資廠打工，學會裡面如何運作、如何處理問題，提升了他們「見世面」的層次，以及自我價值與認同。「抵達該地」是學習的第一步，「到過該地」讓自己的身份產生轉化、地位提升。正如同「學徒式朝聖」概念所強調的，有些地點在特定領域

中有特殊性與顯著性，去過那個地方學習，才能取得社群認可。

但僅有很少數的農民工，能真的在這一趟打工之旅中遇到師傅（我將在「遇見貴人」一節中詳細討論），「見世面」與「學徒式朝聖」這一概念最大的區別在於農民工的朝聖之旅，常常是沒有師傅的學習。在移動中開啟學習，去蒐集、拼貼、串連、組裝旅途中取得的文化品味、社會經驗和象徵符號，成為回鄉後主體轉換與社會地位提升的資本，「移動學習」一詞可能可以更好的概念化「見世面」的現象。

以下我將把農民工學習的場域從城市轉回工廠，去討論農民工如何去突破「去技術化」的障礙，覓得學習的機會。

（二）「被提起來」

農民工進什麼部門通常由主管視需求安排，農民工並不能選擇要去哪裡，但對農民工而言，進不同的部門意味著不一樣的「技術」含量，有些部門工作的經驗能幫助他們往下一步，有些部門的工作經驗則僅僅只是賺取工資。當他們剛從農村裡來的，初進工廠時，最常去的部門是生產部，最常做的職位是生產線最基層的普工，在泰效稱為「員工」。但如果幾個月後，還是一直待在生產線最基層，青年農民工就會開始思考換工作或是回家的可能性，因為這個工作「學不到東西」。

在我訪談的青年農民工之中，常聽到出來打工幾個月之後，就被「提」起來做班長、或進品保部改作品保，或是到模具部門開始當技工。這些普工之外的工作，就是所謂「被提起來」，脫離基層員工的行列。「被提起來」的機會是哪裡來的呢？

泰效工廠的流動率非常的高。普工的流動率是最高的，但一些技術或管理階層也是。翻開工廠內的人事檔案，普工離開的原因普遍寫「家裡有事」。「家裡有事」這四個字背後真正的原因不明，可以有很多種，學不到東西是一種，有別的地方工資更高，或是想去別的城市看看，結婚配合伴侶移動，都是常聽青年農民工敘說的理由。不論真實理由為何，「家裡有事」這個理由在當前的戶籍制度下，拿來當辭工的理由合情合理，因為在戶籍制度下，農民工的家與家人多半仍留在農村，所有「再生產」的事務，如結

婚、照顧老人、養育小孩、生病調養都在仍在農村進行。有些人家裡還有田地的，農忙時也會需要回去幫忙。回家路程遙遠，回去一趟至少就是近一個月，所以乾脆辭工，之後家裡事情忙完，再回來應徵，或讓人介紹到其他工廠。當廠內有人離開，就會有位置空出來需要遞補，遞補方式通常是先從內部挑人來補，此時就會有人「被提起來」。

泰效工廠的管理者對於「學」要先於「用」這件事情完全沒有堅持，並不認為一個工人要先知曉或擁有某種技術之後，才能去從事那個工作。「只要肯學，沒有經驗也沒關係」這是常聽見的話，基層農民工「被提起來」的機會因此不少。

某天晚上在工廠食堂吃飯時，我坐在品保部的課長旁邊，就跟他聊了一下，大家都叫他李課。他是四川人，畢業以後就在台灣的聯發科工作，他說那是大廠，因此品保（品質保證）的要求都很嚴格，當初他們一群同學一起進廠，現在全都走了，只有一個還留在那裡，也在當品保課長。問他為什麼要走，他說大廠還是有些發展上的限制的。大廠的制度比較健全，培訓也做得比較好，都會請外面的人來培訓。他的策略是先進大廠，把一些主要的知識技術都學會了，然後就辭職出來自己闖。那天品保部一下進了四個新員工，我問他，新進員工一下來了四個，好不好帶？他說，只要有培訓就好了，瞭解他們的想法，也接受他們從別廠帶來的意見。我問他：今天進廠的小凡，並沒有什麼QC（quality control品質管控）的工作經驗，為什麼會想用她？李課說：

沒經驗不重要的，沒關係嘛，只要願意學，進來再培訓就好了。如果做一兩個月，還是不行，就把她辭退。最怕的是那種連學都不想學的，因此招人，要找的是心態正確的人，只要肯學，沒有經驗也沒關係。

「公司幹嘛花錢來讓你學習」這種說法，在泰效不管是管理者或是員工，都沒人認同。工程部的山風就說「知識不必先於勞動嘛，知識可以是從勞動中生出來的」。如果先具備某些技術與知識並非挑人的標準，那挑人

標準是什麼呢？刻苦、苦幹、比別人努力，是他們的「共識」。有青年農民工告訴我，「這是農村人的優勢，是城市人的劣勢」，因為「他們吃不了苦」。

絲綢曾做過泰效品保課長的位置，⁷但她只有小學學歷，我問她，怎麼跨出升遷的第一步的？她說當年剛出家門時，是到上海的電子廠當作業員，那時才十四歲，很害羞不敢多講話，只會拼命做，人家叫她做什麼，她就做什麼，有一天品保部長到產線上「挑人」，她就被挑到品保部門去，從頭開始「學」檢驗產品，這一步就開啟／決定了她日後繼續往上升遷的可能性。

阿珠是另一個因為態度好、肯學，所以「被提起來的」例子。我剛到工廠的第一天，廠裡的董事長知道我要來做田野，一方面表示理解（他說：「我也當過研究生」），另一方面也希望我能開班教工廠裡的員工英文。但工廠裡的員工意興闌珊，並沒有什麼人願意學，雖然他們普遍表達對自己書唸的少的遺憾，出來打工後才知道自己懂得不夠多，總希望有機會還可以多學一點，但英文通常都不會是員工想「多學一點」的選擇。這與之前討論過的農民工的學習目標有關，學英文並不被認為能改善他們的生計。但阿珠不同，阿珠是一個表明了對學習英文有高度興趣的農民工。當年我在工廠見到她時，她二十三歲，廣東汕頭人，初中畢業後就出來打工。在產線上做了幾個月的基層員工，就跳槽來泰效，介紹她進來的人在工程部，她就進了工程部協助處理文書業務，成為工程部裡唯一的女性。因為她講話的風格直接幽默好笑，有點陽剛氣質又樂於與人親近，因此在工廠內贏得了很好的人緣，台商老闆也很喜歡她，打麻將人不夠時，就會找她湊牌搭子。我進工廠之後，阿珠每天很積極的找我詢問英文單詞，也會在skype上用英文跟我對話，她央求我幫她取一個英文名字，我給了她幾個選擇，她選了Natasha，後來她就在工程文件上都用Natasha署名。她有一本單字本，一字一字工整的抄著英文單字與中文翻譯。這樣的學習持續了一陣子，後來因為遇上搬廠，生活節

7 後來絲綢因為計劃要去結婚而辭掉工作，但婚事最終又沒有結果，絲綢就希望能再回到泰效工作。但那時候泰效已經找到李課來遞補絲綢的位置，所以絲綢就被派到辦公室當文員，並沒有負責特定職務，她每天的工作就是老闆機動安排。

奏被打亂，這件事也就無疾而終。雖然這過程沒讓阿珠學會英文，但阿珠學英文一事卻在工廠遠近馳名，大家多半是講來取笑她，聚在一起就要她說幾句英文來聽聽，但這件事卻深得台商老闆的心，覺得她是個肯上進、腳踏實地、可信賴的員工，並把她今天的處境理解為僅僅只是家庭條件不好沒能上學，但潛力無窮，不該被埋沒，泰效因此可以投入資源「栽培」她。

金融風暴發生之時，泰效的訂單大減，許多工人閒置，只能安排他們大掃除或是參與教育訓練，此時工廠許多人辭職、跳槽或回家。台商老闆想開發新產品，挖角許多外廠的高階幹部來支援，也讓許多原來的高階幹部覺得不受重視而求去。他們一離開，就一串粽子似的帶走了當初他們介紹進來的人，空下了許多位置沒有人做。阿珠此時就被派去接掌模具組，當模具組的「老大」。即使她對於模具的了解僅止於這幾年工作中偶爾接觸，但老闆仍覺得沒關係，只要阿珠「願意學」，他就「願意給她時間摸索」。阿珠就把辦公桌換到了模具間，拿著許多資料，每天加班，一點一點的從頭開始學起。一開始出了很多錯誤，模具組的員工也不服她，大家都不看好。但阿珠還是堅持在那裡，自學模具的技術，每次問她：「怎麼樣了？」，她都說「還在學」，晚上吃完飯就回辦公室繼續看資料、打電話，日子也就這樣一直過下去。逐漸的，阿珠也開始有了「老大」的樣子，模具組工人也開始願意聽她的話。

2012年，我再跟阿珠聯絡時，她已經從泰效離開，到深圳市內的台商與陸資合資的公司任職，因為摸過模具，所以開始做模具相關的採購工作。2017年她辭工待產，老公在物流業，他們在靠近廈門的漳州，一個剛發展起來的小區買了房子。我去看她，她帶著我在家附近走了一圈，很高興的告訴我：「這旁邊要蓋學校，買這房子學區好」。問她要不要趁這個時間學英文，她搖搖頭笑說：「沒那個勁兒了」。對阿珠而言，現在她要考慮的不是自己的學習，而是她的下一代的學習機會與環境了，教育策略已經出現「家內分工」。

廠內升遷與職位調動是農民工在工廠環境中突破「去技術化」障礙的一種可能性，當「被提上去」，他們就可以逐漸瞭解工作流程，漸漸的把「去技術化」下被切割的碎片拼湊起來。想學服裝設計的，則先進服裝廠，想學

模具的，就先進工廠，正如花花說的，「邊做邊學，先瞭解一下基本的」。他們不是說「邊看邊學」，而是「邊做邊學」。「邊看邊學」仍是旁觀者，學習距離很遠，成效很難把握，具高度非正式性也無系統，端看個人領悟力能夠學到多少，「邊做邊學」則是實踐者，坐到某個職位上，為了有效生產，整個工廠的資源都會幫助你學會做好這件事。

置身工廠，農民工已然進入到一個生產的「從業者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tioners）當中，根據Lave（1991）的說法，即使沒有人「教」，學習就已經在發生。菜鳥在社群當中「合法邊緣參與」，透過觀察其他人的勞動來學習，像阿珠靠著「上廁所時就順便過去看看」來了解要做一個工程部的人需要學會什麼軟體（如Autocad、Pro-E）。只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中，菜鳥並不會自然的隨著時間過去，而自然的從邊緣移動到較靠近核心的區域。

在泰效，菜鳥要從邊緣移動到核心，要先透過習得技術的社會屬性，亦即表示自己是一個「好工人」、「好屬下」或「好幹部」，來取得成為正式社群成員的機會，才能一步步的進入到核心老手的階段。簡言之，在泰效的「邊緣參與」中，農民工是要先證明已成為「好工人」，才能取得習得技術的機會。

但除了工廠內正式實踐社群之外，我在下一節將要指出，「非正式實踐社群」才是農民工「學東西」的關鍵。工廠讓一群「想作老闆」、「想賺錢」的農村青年聚集在一起，討論可能的經商賺錢之道。

（三）「學做老闆」

絲綢和她在網路「老鄉群」認識的農民工，在工餘時間，常找幾個有空空的、聊得比較好的一起聚聚，有時候上工廠附近的小餐館，有時候買點滷菜在宿舍邊吃邊聊。聊天的話題常常圍繞著「找對象」和「如何賺錢」開展。一談到「找對象」常能炒熱氣氛，但談到如何賺錢，大家就嚴肅認真得多。農民工討論著有什麼（工廠外的）方式可以賺錢、容易賺錢，他們分享在工廠裡的觀察，談論從同事、主管或是客戶那裡聽來的各種消息，並各自對市場如何運作的作出評論。這個閒暇時的聚會，可說是農民工們在「學習」市

場運作的相關知識。前面提過的老闆李萬，就是絲綢還有她那一群農民工們瞭解市場如何運作的「老師」之一，「老鄉群」裡其他研發工程師或是管理人員，也是大家有需求時諮詢的對象。

許多農民工進廠打工都是因為「想賺錢」，領工廠薪水是其中一個賺錢的管道，但更想來看看還有什麼其它的生意可以做。農民工進城打工雖是當工人，但普遍都懷著「當老闆」的希望，就像之前的章節分析過的，「當一個好工人」並非農民工真正想做的，他們平常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解市場經濟的運作上。在分析上亦不能忽略，進城打工除了「打工」之外，還是一個「進城」的機會。深圳是一個正式經濟與非正式經濟都比農村老家發達的地方，農民工趁著待在深圳這一段時間，試圖搞清楚目前有什麼商機、什麼生意最好做、或是找機會投資一點小生意。農民工主要透過閒暇時的廠外活動與私下互動聊天，來瞭解「怎麼賺錢」。

農民工閒暇時的聊天聚會群體，近似於Lave所謂的「非正式實踐社群」（Lave 1991），它是工廠的從業者社群之外，由農民工自發組成的社群。在「從業者社群中」，工廠規訓農民工要成為「好工人」，在「非正式實踐社群」中，農民工發展「學做老闆」的實踐社群。「非正式實踐社群」的成型，使得深圳工廠裡的農民工也發展出類似千里達群島的「即興經濟」，靈活的結合正式經濟與非正式經濟，在受聘於工廠的同時，又藉著地利之便，發展各種小生意。楊熙山是一個例子。

楊熙山是一個年紀比一般農民工都大的工人，2008年我遇到他時，他已經28歲了，河南人，離過婚，有一個女兒，女兒留在老家讓爸爸媽媽帶。他比一般的農民工看起來更加內斂老成，不太跟其他人嬉哈打鬧，講話比較正經八百，但他的同事還是都很喜歡他，聚餐、爬山、吃宵夜都會約他，他也不會拒絕。熙山靠打工賺一份薪水，但把他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工廠外的市場上，不時盤算著在工餘時間能夠做點什麼小生意來多賺點錢。

2008年到2018年之間，熙山平日在泰效工廠做品保員，另一方面趁著假日，在工廠外做小生意。首先，他嘗試賣油。熙山在工廠打工這一段時間，常常觀察工業區裡的供需狀態，他很快就注意到，每個工廠都自己辦食堂，很多食堂都外包給外面來的商人做。食堂裡都要用油，依規定要買商標油，

來外包食堂的商人若想多賺點錢，求取更大利潤，常常透過各種來路，買非商標油來替代商標油。熙山瞭解了這個情況之後，想到自己家鄉剛好產花生，就決定攢錢，買一台榨油機，再從家鄉進原料花生，自己榨油。榨好之後就用比商標油便宜的價錢，賣給附近工廠的食堂。他這個生意很好做，利潤也高，他靠這個賺錢，比他在工廠裡的薪水都要高。

後來，非商標油被取締了，這個油品的生意就做不下去。熙山又找了個管道去學習男士剪髮，計畫著回老家以後，就到附近的鎮上去開一家髮廊。為了練習，他平常假日就在廠區裡免費幫農民工們剪髮。這服務很受歡迎，大家都覺得能省下一筆開銷，熙山剪得也讓人滿意，人緣就更好了。後來，熙山又買了一輛摩托車，在假日有空時，就騎著摩托車在路邊載客，在工業區這一帶做「摩的」（摩托車型的計程車）生意，把有運輸需求的農民工從一個地方載到另一個地方，收點費用。

這些生意是斷斷續續的，會隨著意外而來的機會而暫停，或因為取締而取消。再過一陣子，熙山有朋友來找他合夥開店，熙山就把泰效的工作辭了，和朋友一起去深圳街上賣早餐。生意很成功，熙山也賺了錢。但後來，城市治理的政策改變，對他們的早餐店進行整改，早餐店被迫收起來，熙山還被城管罰了錢。熙山那時就又聯絡泰效的同事們，打聽有沒有機會再回工廠，泰效剛好缺生產管理，老闆覺得他還算老實可靠，比起用一個新人要更讓人放心，就讓他回來當生管。

從熙山的例子可以看出，普遍被放置在「農民工」範疇內的熙山，在深圳不只是工人，還是小老闆，他在正式經濟和非正式經濟之間進進出出，靈活結合兩者，實踐「即興經濟」。深圳對他而言是工業區，也是市場。熙山一方面被工廠「去技術化」的生產環境規訓，但也透過「在（市場）現場」的機會，去觀察、模仿，透過在現場默會與親身實踐，來學習做生意之道。

學當老闆的「非正式實踐社群」，相對於學做工人的「正式實踐社群」，它自主形成，平行並存於農民工的日常生活中。2018年，我再回到深圳泰效時，發現許多當年工廠裡的工程師，已經離開泰效自己開了小工廠。我拜訪了當年在泰效認識的工程部的職員，他的老婆當年在另一家工廠當生產課長，現在兩人一起在深圳有了一家小工廠，產品跟泰效一樣，只是規模

小了很多。而當年的廠長和工程部的幾個幹部也都一起出去合夥開了另一個工廠。

值得一提的是，工廠內的「非正式實踐社群」受到性別的高度影響。對男性農民工而言，他們熱衷於討論如何賺錢，對大部分女性農民工而言，她們更喜歡討論「找對象」的策略與可能性。並非女性農民工沒有賺錢的渴望與離開工廠自主創業的老闆夢，只是她們更傾向把找對象及做老闆的目標結合在一起。某天，我聽辦公室總務愛琴跟她朋友的聊天，愛琴說：

現在做生意很難做的，還是老老實實打工打幾年吧。我現在很想找一個比自己年紀大一點，然後自己做生意的人。有店面。像我表妹那樣，那個人自己在深圳，開了一個文具店，我覺得挺好的。我也想找一個有事業的男人。

像愛琴這種透過找老公來實現做老闆的想法，在女性青年農民工中相當普遍。女性農民工常會挺認真地笑著說：「婚姻就是女人最大的事業啊」。

這種想法的根源可追溯到文化的作用，漢人社會中經濟活動被認為應該由男性主導，女性常是丈夫的輔佐而非主要的行動者。未婚女性在自主形成的非正式實踐社群中，比較少是以「可能共同做生意的合作夥伴」來參與，更多是被當成「可能的婚配對象」。已婚婦女則以她們老公伴侶的身份來參與，經濟活動被當成夫妻一體。

也有純屬於女性的非正式實踐社群，在這裡，女性農民工彼此討論如何挑選好的結婚對象，已婚的女性則提供建議與可能人選。在選擇對象時，學歷並沒有被特別重視，打工的經歷被認為「可以補足男人在學歷上的不足」。例如愛琴表示：「沒讀書又沒什麼，只要兩個人談得來。反正我沒想過學歷這個問題，只要高中以上就可以了。如果是初中的話，那最好是在外面打工打了好幾年的，比較成熟一點。」

簡言之，當農民工宣稱想要透過打工來「學東西」時，「進城」本身也是需要被列入考慮的因素。他們不見得是要學工廠內的技術，反而是想要藉機了解市場來從事生意。工廠裡「去技術化」的生產環境因而不會阻擋他們

前來「學東西」，來工廠打工本身就是提供給他們一個機會，能夠接近市場經濟，在其中「邊緣參與」，學習在市場經濟中做生意的技藝。

沒有辦法「拜師學藝」，只能「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在這趟見世面的移動學習之旅中，有些人真的會遇到願意帶著他們、教導他們的人，農民工常以「貴人」稱呼這些人。以下我將以正紅的例子來說明。

（四）遇見貴人：是師傅也是恩庇主

「遇見貴人」是一種較為特別的經歷，較少農民工適用，但在一個很特定的政治經濟結構下，台商與陸籍屬下之間，也經常發生這樣的學習形式。在前面的章節裡已討論泰效工廠裡，技術的學習過程並沒有正式安排「師徒制」，就算有類似師徒制的實踐，也因為生產流程被高度去技術化，師徒關係也只會是非常短暫的過程。但有一種相對長久、可持續的「師徒」關係，確實存在於泰效工廠中，其介於教授與學習、合作與互利、以及恩庇侍從關係之間，我用農民工的詞，稱之為「遇到貴人」。以下我將以宅正紅為例來說明。

宅正紅是廣西人，從中專畢業後來深圳打工，就一直在台商工廠工作。在第一個台商工廠中，他很快的就「被提起來」，跟台灣來的直屬主管建立相當深厚的信任關係。正紅稱他為「師傅」，師傅教給正紅管理的技巧與工程的知識，以及如何看清工廠裡複雜的政治關係，正紅則回報以拼命工作與效忠。正紅向我分析，在台商工廠裡，台幹喜歡陸籍農民工來作部屬，並在其中挑投緣的「做徒弟」。台幹會訓練他們、提拔他們，好培養「自己人」。這一方面是因為陸籍的農民工都想往上爬，有主管願意教，給他們表現機會，他們通常會前仆後繼，全力以赴。另方面，台幹對於陸籍的部屬「比較放心」，因為在台商工廠，這些陸籍的部屬不管表現多麼出色，都不可能與台幹競爭，取代台幹的位置。正紅就在他第一個打工的台商廠裡遇到他的第一個師傅，這個師傅讓正紅從農民工變成「工程師」。幾年後，正紅就跳到了泰效工廠，正紅說雖然他很感謝第一個師傅，但繼續待下去他覺得沒有發展，「年輕人要出來闖一闖」。

來到泰效之後，正紅先做品保部的工程師，後來品保部課長「出了一點問題」，正紅就變成副課長。據說是課長跟供應商收取費用，被老闆知道，但老闆又找不到證據，無法直接解僱他，於是老闆就把正紅「提上來」，希望藉此把課長架空，逼課長自行離職。正紅說：

在公司裡面達到某一定的職務，就一定會有心地問題，心地問題出來的時候，就看你是貪大還是貪小的問題啊。那所謂的大貪都是從小貪開始。……你整個管理層尤其是高級管理層，都鬥志銳減，業績又在下滑，你說我們下面這些……怎麼弄？那當時老闆的決策就是，要把我提上來。提上來的目的，我個人猜測，就是要架空。一般的運作模式都是這樣，工廠的運作模式，要架空一個人，首先就是把一個人提升為他的所謂的副，那副往往都是幹吃力不討好的事情。那副很容易轉正嘛。那副往往都是幹那些苦力活的嘛。幹苦力活就會成長起來。架空，變得沒辦法，（正）他不離開怎麼辦。

在幹「副」，亦即品保副課長的過程中，老闆常常找正紅一對一談話，要正紅報告品保部的運作狀況，並對正紅面授機宜，幾乎等於是老闆透過正紅自己在當品保課長。正紅對那段時間的印象是「吃力不討好」、「幹苦力活」，但「也會成長起來」。後來課長也真的走了，正紅在那時候反而沒有想要「轉正」。他毛遂自薦轉任業務。正紅描述了他當時的決定過程，他說：

做一個品保副理來講，兩年過後，我要重新考量現實的問題。第一點，我是等死咧？還是找死咧？所謂等死就是，我在這個職務上面已經做得很順了，那我沒有壓力了。沒有壓力的問題變成我就會自甘墮落下去，那就是等死。第二個情況就是我在公司裡面沒有價值的時候，我就成為公司的累贅跟包袱，公司自然會把我清掉。兩種死法。這必然的，公司就是有一個優勝劣汰的體制在那裡。那我勇敢的跟老闆講一句話說，我說我要做業務，歡迎新的環境。我雖然

說我不懂業務，那是手法問題，可以學。但我的專業能力是在短時間內，別人學不了的。

之後所有當業務的技巧，都是老闆親自教他的。正紅把跑業務的技巧等同於「做人」的技巧，正紅說：

我怎麼跟客戶打交道，其實跟客戶打交道重點就在，七分做人三分做事啦。那跟客戶打交道不就是學會做人嗎？比如說，做人的話，我講個比方。比如說美國的業務來講，他們談事情就是，大家吃個飯，在飯桌上面談一談就完了，就這樣結束。我沒那麼多時間跟你交好。那這是美國的業務，他就是節奏很快。那日本現在的業務是什麼呢？不是先談業務，是先談所謂的人情事物。比如說融入到你的生活。那是很恐怖的。慢慢就會拉近這個感情啦，這樣反而業務就會水到渠成。那這種業務只要你站上去過後，很難有人替換掉。即使有人替換掉，一定要拿你相同的方法，才能替換掉。否則很難啦。那我現在走的就是這種路線，因為老闆教的。

正紅稱泰效老闆是他的貴人，認為如果沒有遇到他，他今天的發展不會是如此。正紅認為工廠裡「學習」的障礙發生在忌憚別人學會了會來競爭。很多大廠裡的僱員互相防備，你問他，他也不會跟你說，正紅說：「他會把自己顧的像銅牆鐵壁一樣，防止你學到東西把他踢掉，換替他的位置啊」。這種狀況下，還有學習的可能嗎？正紅說：「還是多在現場去作業、操作」。

他與泰效老闆相互認定是師徒關係，雖然並不會在口頭上叫師傅或徒弟。正紅說：

因為老闆也提到，我這邊也總結出來了，他一生中收了很多徒弟，他有講一句話，就是我也接受了，叫什麼咧，「他（指正紅）是我收的最後一個徒弟。」最後一個徒弟，也是關門弟子啦。那我這

個徒弟咧，就是最笨的一個徒弟。他收的徒弟中，很聰明很多都有阿。我是最笨的一個。但我是他所有徒弟中最勤勞的一個。苦戰阿，所謂苦行僧一樣。今天有可能我在學這個東西，聰明人有可能十分鐘搞定了。那我十分鐘肯定沒法搞定嘛，那沒關係嘛，我十分鐘不行二十分鐘，二十分鐘不行我兩個小時，我總能搞定吧。那沒關係嘛，那今天白天八個小時有可能處理事情，那我晚上延後嘛。那到這個十年之間來講，我晚上有時候工作到一兩點很正常阿，最早期的那個時候，現在也到十一到十二點阿。那問題是什麼咧，自己不足阿。那你自己不足還沒想辦法自己補救那不是等死嗎。那就多學一點，多弄一點嘛。

正紅幾年來一直常常跟著老闆跑，即使沒有特別要做什麼，老闆也帶著他，讓他在旁邊看著、跟著，正紅用「我就跟著他」來描述，老闆工廠的事情找他談，家裡的事情也找他談，正紅跟老闆學的不只技術，更是模仿老闆整個人的行為舉止與思考方式。正紅認為老闆不只是「師傅」，徒弟跟師傅學技術只是為了提高薪水，徒弟技術學完了就離開（如同他和第一個台商工廠裡的師傅），他認為泰效老闆是「貴人」，在「培養」他，培養他看到更高更遠的未來。因為老闆深知深圳經濟特區中當業務有太多的「糖衣花粉」會腐蝕人，就常找正紅「心理輔導」，提醒他眼光要放長遠，別被這些給腐蝕，正紅說：

那時候老闆講一句話，叫做好鋼易斷，很好的鋼啊容易折斷啊。那一定要添加所謂的元素在裡面去，化學成分在裡面去，讓它又硬嘛，又不那麼容易折斷嘛。那時候就是害怕我被夭折。

正紅每次到台灣出差，就住老闆台北老家佛堂裡，住久了正紅覺得跟老闆家的觀音很有緣，請求許可後，就把觀音請到了深圳的工廠，放在董事長的辦公室裡，每天由正紅和正紅老婆負責上香、維持清潔。老闆雖然自己也不太信佛了，但也跟正紅聊了一些佛法，正紅覺得很受啟發，他生長在無神

論的共產主義下，沒有接觸過任何宗教，這些觀念對他而言很新鮮，有時候挫折焦慮時，在觀音面前靜靜的坐一下，他覺得整個心就靜下來了。

許多農民工在打工的旅途中，都渴望能夠像正紅一樣能「遇到貴人」。在工廠裡「遇到貴人」因而「學東西」的管道跟機會可遇而不可求，並非人人都有機會遇到，但也並非罕見。我常聽聞深圳、昆山的工廠老闆提拔某個年輕人，未來安排他接班，甚至把女兒嫁給他，來確保關係能夠一直維持。泰效的台商老闆一直有想把工廠交給陸幹經營，自己回到台灣發展的打算，正紅剛好在這個時間點被他挑上。正紅說老闆是他的「貴人」，他們之間的關係，介於師徒關係和恩庇侍從之間。

Lave (1991) 的學習理論主張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下，學習技術的過程中已經不可能同時取得成員資格，知識變成擁有而非共享，正如同正紅所指出，在內部競爭激烈的工廠裡，技術與知識都被特定群體掌握，在特定的圈內流傳，群體與群體之間進行權力鬥爭，彼此防範，確保不讓知識、技術與人員外流，要取得技術與知識，首先要先確認成員資格，進入到社群圈圈之後才可能發生。

五、討論與結論

人類學家、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已有許多研究揭露現代學校教育可能造成的負面後果。現代學校教育的制度存在本身，常會把價值給標準化與絕對化，這常造成農村、部落與工人的世界觀與傳統知識體系失去價值，使人失去自尊。當學校幫助這些地方的一些孩子成功之際，同時在製造很多的「失敗者」（Bloch 1998；Corbett 2004；Goldsmith, et al. 1995；Illich 1973；Levinson and Holland 1996；Stafford 1995）。學校教育對農民工造成的經歷可說是一種「意義無產化」的過程，這比起生產工具的無產化造成的階級不平等更不易覺察，因為教育普及普遍被認為立意良善。學校教育能幫助社會流動，幾乎成為不受檢討的意識形態，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很容易忽略城鄉與階級的價值差異，把偏惠特定階層、區域的價值給制度化與標準化，把知識的位階給固定化，其後果是無聲無息、強有力的在發揮分層、歸類與排擠

的作用。

在民族誌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論證農民工在「看穿」自己在學校中的不利位置之後，其擴充想像與尋找可能性的方式並非透過反抗，或形成表述清晰的反學校文化，而是「繞開」學校，自行「修復」，期能不需靠學校完成向上流動與社會地位提升。農民工在學習時「繞開」學校、「繞開」正式學習的決定，並非是因為他們是「壞學生」。這個標籤無助於理解任何事情，也不是用盡各種教育資源幫助他們變成「好學生」就可以解決問題的。這些「一腳出校門、一腳進城門」的中輟青年不是思想落後，不是不受教，不是沒有上進心，不是不想學習，不是被絢爛的城市現代性與消費世界給吸引，而是早看穿他們在結構化中所處的不利位置，看穿學校教育的階級性與城鄉差異不可能幫助他們改善生計與提升社會地位之後，為自己的學習尋找替代方案的結果。從比較正面的角度來看，這反而展現他們在對抗不利結構時的修復能力與能動性。

選擇「繞開」學校，是因為農民工看到「移動」的可能。農民採取對抗不利結構的方式是「移動」——用一種不直接挑戰體制、要求制度重組的方式——設法去逃開不利於自己的制度結構，到另一個社會脈絡來獲得接近其缺乏的資源機會，並透過自己的勞動（如勤奮、苦幹、態度好、能信任……），去取得、拼貼及組裝這些資源，試圖披荊斬棘、開荒拓土的闢出一條他們可以向上流動的道路。農民工這種透過「移動」到不同的地理空間與社會場域，一方面「合法邊緣參與」該社會場域的知識與技能，取得學習資源，另方面則透過移動，利用城鄉之間的結構裂隙，去挪移文化品味、社會經驗與象徵符碼而成為資本，進而達成向上流動與地位提升。這種不挑戰既定的結構，透過移動來取得能動性與賦權的學習方式，我稱之為「移動學習」。

「移動學習」某種程度確實幫助農民工在一個城鄉二元體制下，面對教育資源缺乏、農民素質落後、經歷「意義無產化」之際，找到一個看似能夠繞開學校，自行修復並向上流動的可能性，但在結構的夾縫中，農民功能找到的種種替代學習方案都是有限制的。農民工洞察了學校教育體制、看穿了要他們做個好工人的職業培訓，但最終他們的洞察卻在當老闆與見世面的

願景之前止步，看不清楚這條路的不確定性與風險，他們的洞察因而發生了限制，最終僅是「部分洞察」。而這些限制，也讓大多數的他們最終僅能成為做小生意的小老闆、產線中的小主管、或是在城鄉之間奔波往來、尋求各種機會的農民工，卻難以真正往上流動。例如，雖然工廠內「被提上來」的現象，在普工的層級中是非常普遍，但做到了產線小組長之後，再往上就相當困難了。要像絲綢、正紅這樣一路做到品保課長的，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此外，他們一但靠著「被提上來」或「遇到貴人」的方式往上升遷，他們的資歷也不見得會被其他工廠承認，甚至自己也沒有自信，造成難以跳槽，或是跳槽後又要從頭開始的狀況。因此這樣的「學習」方式常不連貫，缺乏系統，過度依靠過往經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常不能隨機應變解決問題。另外，農民工在工廠裡做了一段時間後，幾乎都對於市場如何運作，哪些生意好做，有一套自己的說法與「理論」，但「學做老闆」一樣在農民工內部就有階層分化，工程部幹部形成的「非正式實踐社群」不管在技術與資訊上都較接近核心，能夠幾年後出去一起合夥開工廠。但一般來說，在農民工層級裡，「非正式實踐社群」對「學做老闆」提出與討論的點子、作法的想像，多半都是來自跟他們相同階層的人，因此能想到的都是低成本、低技術的行業，也就是普遍所說的非正式經濟，規模小、資本低，可以賺一點錢，但也高度不穩定，使得他們在工廠與小生意之間來來回回，彷彿圓了老闆夢，但又無法跳脫這個階層，達到真正的向上流動。「見世面」雖然讓農民工在家鄉農村取得認可（比起在家「偷懶打混」更容易被接受），但其聲望也多半僅止於「看得到的」、「說得出的」層次，要做到「能拿主意的」，就必須能做到長時期待在城市裡尋求生計，這需要許多的機遇與運氣。這種「學習」讓農民工陷入了一個無法逃脫的循環：到城市打工取得移動資本（包括城市裡的資訊、見聞及經驗等），回家取得聲望後，又必須再回到城市打工，如此再回家時才能繼續維持聲望，進城打工因而成為一種農村青年永不停歇的朝聖。

簡言之，「移動學習」作為一種學習途徑，學習所需的資源、機會與每一步的銜接，皆非制度性過程，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等待、巧合、主管的賞識和學習者自己的額外勞動（例如表現出忠誠，苦幹，勤奮等）來達成。這

條路窄小而破碎，卻讓我們更看清學校機制鋪出的康莊大道與農民工自行披荊斬棘出的拓荒小徑在資源與前景上的巨大差異，而這也讓我們不禁反思學校教育，到底嘉惠了誰？

最後一個部分，我將從三個面向來為「移動學習」做出學術定位。首先，我將討論「移動學習」對於我們進行教育方面的民族誌研究可能會有什麼幫助。其次，我將談「移動學習」對於人類學研究的可能貢獻。最後，我則試圖以農民工「移動學習」的案例，去對教育機會上的城鄉差異與階級不均等可以如何改善作出建議。

首先，從教育研究的角度來思考，我們不禁要問，到底什麼樣的教育與學習管道對於農村底層青年最為有利／有效？學校教育中的城鄉差距究竟要如何解決？教育到底要離農還是為農，強調實踐或是強調概念的爭辯由來已久，終未能有定論（Pepper 1987；莊孔韶與王媛 2011）。從泰效工廠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的例子來看，技術與知識在深圳工廠中無法學習的最大障礙並非去技術化，而是知識與技術的社會性。在農民工的例子中，知識與技術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經歷一系列的社會過程，被辨認、分級、評價、標定與承認／不承認，最後甚至被標價。這一系列「知識社會化」與「技術社會化」的過程，讓被預設為是中性透明良善的知識與技術的傳遞過程，不可避免的要與參與者的社會地位、社會關係、社會網絡，以及彼此的競爭合作等社會互動交織在一起。經過這些社會過程的知識與技術，不再是社群共享，而是被層層加工認證過的，知識與技術的取得就成為一個排擠與涵納的過程，並變成一個劃分人群界線的機制。

若我們要更好的理解這些社會過程，對教育的研究或許不該只侷限在學校內部的運作狀態，而以學習者為主體的「學習民族誌」能夠幫助我們走出學校及走進學校所坐落的社會脈絡，透過追蹤社會行動者的學習目標，以及其透過何種方式取得他所需要的知識技能的學習過程中，我們可以打破學校教育與非正式學習的二分思考，拓寬我們對教育的想像與理解，進一步能夠對學習、知識傳遞、文化傳承與主體形成這些夾雜在一起的過程，彼此之間的關係與運作機制有所了解、做出闡釋。

因此，在本文中，我特別注意有別於學校傳授的知識型態、傳授管道與學習形式究竟是什麼，並試圖解釋那些知識／技藝傳遞管道與學習形式，為何會吸引那些認定「學校學不到東西」的農民工。更能激起農民工學習的學習方式是生活、勞動與學習的界線模糊，也無教與學的二分，能透過現場觀察、旁聽、模仿、默會、實作、競爭與合作以及經驗分享等來習得知識與技術，並在取得一項知識與技術的同時，也取得了該實踐社群中的身份。但這些在學校機構設立之後，全部都變成「非正式的」。學校機構的設立本身就把生活與教育分開，在知識課程化的過程中，也很大程度刪減掉了知識與社會的關係，或切斷知識與社會的連結。我們必須對於學校教育如何限制或窄化了傳授知識的型態、管道與可能的學習形式更加警覺，免得讓學校淪為一個篩選的機制，而非真正傳遞知識的機構。

其次，我試圖透過「移動學習」這個概念來補足人類學研究中缺失的一角：在教育人類學與經濟人類學之間的空白地帶。人類學的教育研究普遍不關心經濟與生計面向，經濟人類學的研究也很大程度忽略主體形成背後的學習過程。「經濟／生計學習」剛好跨在教育人類學與經濟人類學的重疊之處，但在兩個次學門中同屬邊緣，乏人聞問。本研究試圖以農民工的「移動學習」在教育人類學與經濟人類學的接口處去搭起橋樑。我主張應重新定位對教育研究的視角，從教育轉向學習、從教什麼轉向怎麼學，學校外的學習也應該是教育人類學關注的焦點。而經濟人類學即使非常關注經濟主體的建構與在新的政治經濟型態下的轉變，卻完全忽略學習的過程。新的經濟主體（如新自由主義主體）的建構與轉變都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看向學習過程幫助我們理解主體建構與形成過程，這是本篇文章要補足的漏洞。若學習是一個「從這裡到那裡」的過程，個體的經濟決定，不見得如實反映其經濟位置。農民工在工廠裡被規訓要做一個好工人，但他們都想透過「靈活的」學習去「當老闆」，階級形成的過程，因而必須考慮移動、想像、期待、慾望、希望等因素，以及個體所經歷的各種學習過程，在其中，社會行動者主動抓取並拼貼組裝資源所帶來的可能性。「移動學習」可以豐富我們對於階級形成過程的理解。

最後，透過理解農民工的「移動學習」，本文試圖指出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的分野對於社會底層的行動者而言並非截然二分，要改善底層青年的教育機會，學校教育之外，如何協助他們走一條不靠學校的向上流動路徑，可能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取徑。

參考書目

林育生 Lin, Yu-sheng

- 2014 遠行與作功德：泰國東北社會男性跨國移工的性別政治與行動意義 Yuanxing yu zuogongde: Taiguo dongbeishehui nanxing huaguo yigong de xingbiezhengzhi yu xingdongyiyi [Mobility and Making Merit: The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Meaning of Actions of Trans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from Northeast Thailand]。臺灣東南亞學刊 Taiwandongnanyaxuekan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0(1): 33-70.

莊孔韶、王媛 Zhuang, Konshao and Yuan Wang

- 2011 評議離農、為農爭論：教育人類學視角的農村教育 Pingyi linong weinong zhenglun: jiaoyu renleixue shijiaode nongcunjiaoyu [Comments on the Dispute of For Agriculture or Against Agriculture: Rur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廣西民族大學學報 Guangxi Minzu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33(2): 79-83.

夏柱智、賀雪峰 Xia, Zhuzhi and Xuefeng He

- 2017 半工半耕與中國漸進城鎮化模式 Bangong bangeng yu zhongguo jianjin chengzhenhua moshi [China's Semi-Industrial, Semi-Agricultural Mode and Incremental Urbanization]。中國社會科學 Zhong guoshe hui ke xue [Chinese Social Science] 12: 117-137.

夏茂林、孫佳慧 Xia, Mao-lin and Jia-hui Sun

- 2019 我國學前教育經費支出城鄉差距的實證分析及政策建議 Wo guo xueqian jiaoyu jingfei zhichu chengxiang chajudi shizhengfenxi ji zhengcejian yi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Gap of Education Cost between Preschool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and Suggestions for Policy Making]。當代教育與文化 Dang daijiao yuyuwen hua [Contemporary Education and Culture] 11(1): 108-113.

楚德江 Chu Dejiang

- 2012 城鄉二元結構值得留戀嗎？與賀雪峰先生商榷 Chengxiang eryuan jiegou zhide liulianma? Yu Hexuefeng xiansheng shangque [Is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Worthy of Retention: Discussion with He Xuefeng]. 學術界 Xue shujie [Academics] 172: 125-131.
- 賀雪峰 He, Xuefeng
- 2014 論中國式城市化與現代化道路 Lun zhongguoshi chengshihua yu xian daihua daolu [On the Chinese Path of Urbanisation and Modernisation]. 中國農村觀察 Zhongguo nongcun guancha [China Rural Watch] 1: 2-12.
- Adler, Judith
- 1985 Youth on the Road: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Tramping.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2(3): 335-354.
- Anagnost, Ann
- 2004 The Corporeal Politics of Quality (Suzhi). *Public Culture* 16(2): 189-208.
- 2006 Strange Circulations: The Blood Economy in Rural China. *Economy and Society* 35(4): 509-529.
- Bloch, Maurice E.F.
- 1998 How We Think They Think: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Cognition, Memory, and Liter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Braverman, Harry
-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Carrier, J. G
- 1992 Emerging Alienation in Production: A Maussian History. *Man, New Series* 27(3): 539-558.
- Chi, Jin, and Nirmala Rao
- 2003 Parental Beliefs about School Learning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Ethos* 31(3): 330-356.
- Chen, Yuanyuan, and Shuaizhang Feng
- 2013 Access to Public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6: 75-88.
- Corbett, Michael
- 2004 "It Was Fine, if You Wanted to Leave": Educational Ambivalence in a Nova Scotian Coastal Community 1963-1998.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35(4): 451-471.
- Fang, I-chieh
- 2010 'Talking' Landscape: The Culture Dynamics of Rushang (Confucian Entrepreneurs) in a Peripheral Migrant Hometown in Yunnan.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1(2): 191-204.

Froerer, Peggy, and Anna Portisch

- 2012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Learning, Livelihoods, and Social Mobility.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43(4): 332-343.

Goldsmith, Edward, Martin Khor, Helena Norberg-Hodge, and Vandana Shiva

- 1995 *The Future of Progress: Reflections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Dartington: Green Books.

Goodburn, C.

- 2009 Learning from Migrant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Schooling of Rural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9(5): 495-504.

Gowlland, Geoffrey

- 2009 Learning to See Value: Ex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Vision in a Chinese Craft. *ethnos* 74(2): 229-250.
- 2012 Learning Craft Skills in China: Apprenticeship and Social Capital in an Artisan Community of Practice.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43(4): 358-371.

Griffith, Lauren Miller, and Jonathan S. Marion

- 2018 *Apprenticeship Pilgrimage: Developing Expertise through Travel and Training*.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Herzfeld, M.

- 2004 *The Body Impolitic: Artisans and Artifice in the Global Hierarchy of Val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llich, Ivan

- 1973 *Deschooling Socie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Jacka, Tamara

- 2006 *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Gender,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rmonk, N.Y.; London: M.E. Sharpe.

Kaelber, Luts

- 2006 Paradigms of Travel: from Medieval Pilgrimage to the Postmodern Virtual Tour. In *Tourism, Religion and Spiritual Journeys*. D.J. Timothy and D.H. Olsen, eds. Pp. 49-64. London: Routledge.

Kipnis, Andrew

- 2001 Articulating School Countercultures.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 32(4): 472-92.
- 2007 Neoliberalism Reified: Suzhi Discourse and Tropes of Neoliber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3(2): 383-400.

Koo, Anita

- 2012 Is There Any Chance to Get Ahead? Education Aspir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Migrant Familie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3(4): 547-564.
- Lave, Jean
- 1991 Situating Learning i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In Perspectives on Socially Shared Cognition*. L.B. Resnick, J.M. Levine, and S.D. Teasley, eds. Pp. 63-82: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Lave, Jean, and R. McDermott
- 2002 Estranged Labor Learning. *Outlines. Critical Practice Studies* 4(1): 19-48.
- Levinson, Bradley, and Dorothy Holland
- 1996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the Educated Person: An Introduction. *In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the Educated Person: Critical Ethnographies of Schooling and Local Practice*. B. Levinson, D. Foley, and D. Holland, eds. Pp. 1-56. Albany: SUNY Press.
- Li, Jin
- 2001 Chinese Conceptualization of Learning. *Ethos* 29(2): 111-137.
- Lin, Bih-jaw, and Li-min Fan
- 1990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Review and Evaluation.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 Ling, Minhua
- 2015 "Bad Students Go to Vocational Schools!": Education,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Youth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73: 108-131.
- Makovicky, Nicolette
- 2010 'Something to Talk About': Notation and Knowledge Making Among Central Slovak Lace Maker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6(s1): S80-S99.
- Marchand, Trevor H. J.
- 2008 Muscles, Morals and Mind: Craft Apprenticeship and the Formation of Pers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56(3): 245-271.
- 2010a Embodied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with British Fine Woodworker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6(s1): S100-S120.
- 2010b Making Knowledg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ssoluble Relation between Minds, Bodies, and Environment.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6(s1): S1-S21.
- Monsutti, Alessandro
- 2007 Migration as a Rite of Passage: Young Afghans Building Masculinity and Adulthood in Iran. *Iranian Studies* 40(2): 167-185.

Munn, Nancy

- 1992 *The Fame of Gawa: A Symbolic Study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in a Massim Socie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Naji, Myriem

- 2012 Learning to Weave the Threads of Honor: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Female Schooling in Southern Morocco.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43(4): 372-384.

Noy, Chaim

- 2007a *A Narrative Community: Voices of Israeli Backpackers*.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2007b Travelling for Masculinity: The Construction of Bodies/Spaces in Israeli Backpackers' Narratives. In *Tourism & Gender: Embodiment, Sentuality and Experience* A. Pritchard, N. Morgan, I. Ateljevic, and C. Harris, eds. Pp. 47-72. Oxfordshire: CABI.

O'Donnell, Mary Ann,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

- 2017 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pper, Suzanne

- 1987 Education for the New Order.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R. MacFarquhar and J. Fairbank, eds. Pp. 184-2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ne, Frances

- 2014 Migration as Hope: Space, Time, and Imagining the Future. *Current Anthropology* 55(S9): S95-S104

Portisch, Anna Odland

- 2010 The Craft of Skilful Learning: Kazakh Women's Everyday Craft Practices in Western Mongolia.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6(s1): S62-S79.

Prentice, Rebecca

- 2012 "No One Ever Showed Me Nothing": Skill and Self Making among Trinidadian Garment Workers.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43(4): 400-414.

Pun, N., et al.

- 2009 The Peasant-turned workers: their incomplete proletarianization. *Open Times* 6: 5-35.

Pun, Ngai, and Huilin Lu

- 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 1-27.
- Rao, Nitya, and Munshi Israil Hossain
2012 "I Want to Be Respected": Migration, Mobi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lternate Educational Discourses in Rural Bangladesh.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43(4): 415-428.
- Simpson, Edward
2006 Apprenticeship in Western Indi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2(1): 151-171.
- Stafford, Charles
1995 *The Roads of Chinese Childhood: Learning and Identification in Ang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lentin, K.
2012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Mobile Livelihoods: Social and Geographical Routes of Young Nepalese Migrants in India.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43(4): 429-442.
- Venkatesan, Soumhya
2010 Learning to Weave; Weaving to Learn... What?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6(s1): S158-S175.
- Willis, Paul E.
1981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u, Jieh-min
2011 Strangers Forever? Differential Citizenship and China's Rural Migrant Workers. *Taiwanese Sociology* 21: 51-99.
- Xiong, Yihan
2015 The Broken Ladder: Why Education Provides No Upward Mobility for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21: 161-184.
- Yan, Fei
2005 Education Problems with Urban Migratory Children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 32(3): Article 2.

方怡潔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300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

icfang@mx.nthu.edu.tw

Bypassing, Repairing, and “Mobile Learning”:

A Learning Ethnography of Shenzhen Young Migrant Workers’
“Being a Boss” and “Seeing the World”

I-chieh Fang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 Paul Willis’s “Learning to Labour”, the lads articulate ‘anti-school culture’ as their reaction after penetrating/seeing through the schooling mechanism. This paper will demonstrate some other reactions to seeing through the school system, through the case of migrant workers in Shenzhen China. These reactions are: bypass, repair, and “mobile learning”. By analyzing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displayed by a group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in an electronics factory, who left school out of choice but were keen to lear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obile learning” allows social actors to imagine and realize new possibilities without challenging the existing structure. Migrant workers use this method to bypass and repair the school system which is falling apar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migrant workers who drop out from school are not “bad students.” This label is not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ir situation or for solving their problems. Their problems cannot be solved by exhausting various resources to help them become “good students.” These young migrant workers are not backward, unteachable, unmotivated, or unwilling to learn. Rather, they saw through the middle-class nature of schooling and its urban bias, and realized it cannot possibly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s. They become wage labourers in factories in Shenzhen as the result of finding alternatives. Migrant workers who engage in “mobile learning” move to different places and social contexts.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they gain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hat social context, and they collate and assemble such learning resources for their own us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obilize cultural taste, social experiences, and symbol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ettings, and thus create social, cultural, and symbolic capital which enables them to transform their subjectiv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failure of the schooling system. However, “mobile learning” has its limitations. All the re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every transition of this learning process is not institutionalized. “Mobile learning” relies largely on waiting, coincidences, the appreciation of supervisors and workers’ own extra labor (such as showing loyalty, hard work, diligence, etc.). In short, the path of migrant workers’ “mobile learning” is thin and easily ruptured.

Keywords: penetration, de-skilling, informal learning, mobility, labour
